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 《记忆》308期

### 【书讯】

胡鹏池、陈楚三、周宏余编

《从生物馆到200号——清华文革蒯氏黑牢》问世

附：胡鹏池《清华文革蒯氏黑牢》简介

文青著《不周山下》在美出版

文革历史·家庭实录·长篇小说

附：内容简介/作者絮语

### 【思想文化】

伤痕的治愈和社会灾难的“他纠”机制/安希孟

### 【百年中国】

旋律：生命中的纪录仪

——六十年代初中教室里的歌声/马昌海

画说我的一生/刘海鸥

15. 动摇的钢铁长城（1966年5月—1966年7月）（中）

### 【怀人】

写给明天的纪念——我的父亲沈力/言真

钟沛璋之间/丁东

### 【域外见闻】

我眼中的新加坡（5）——高薪养廉面面观/向真

### 【序跋】

痛彻拷问文革中的大学暴力——《蒯大富的黑牢》序/唐少杰

感言四则——《蒯大富黑牢》序/孙怒涛

### 【述往】

我对北京25中文革初期的回忆/白音桦

1973-1977：我的“二外”记忆（11）

——有条纪律是：不许谈恋爱/李红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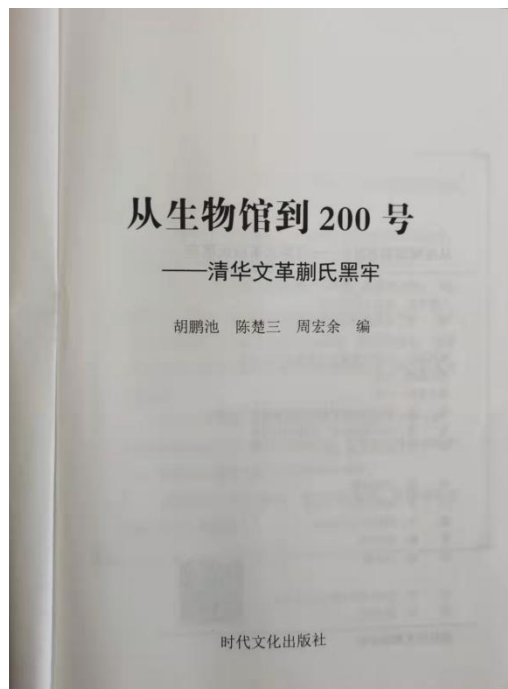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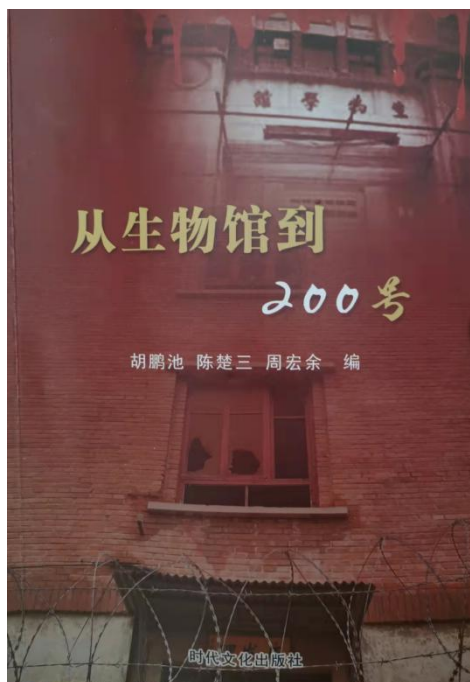
平民往事三则/郑凯民

【书讯】

胡鹏池、陈楚三、周宏余编

《从生物馆到200号——清华文革蒯氏黑牢》问世

香港时代文化出版社，2021年



《清华文革蒯氏黑牢》简介

胡鹏池

本书名《清华文革蒯氏黑牢》是《清华文革蒯大富的黑牢》之缩写。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清华大学成为高层各种势力争夺的重要战场。当时的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曾被北京新市委派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清华工作组的顾问），蒯大富后来依仗中央文革小组的倾力扶植和支持，联合另外两个群众组织成立《井冈山兵团》，在清华大学掌了权。掌权后的蒯大富，步工作组后尘，反过来把不同意见的群众打成“托派”“反动逆流”，导致《井冈山兵团》分裂，继续拥护蒯大富的被称为“团派”，对立面是“414派”，414派的主要负责人是工程力学数学系二年级学生

沈如槐。

414派抵制蒯大富推行的一系列极左政策，坚持清华大学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观点，得到广大中下层干部的支持，引起蒯大富的恐惧，于是处心积虑，捏造罪名陷害一批支持或倾向414的干部，并造谣414被以沈如槐为首恶分子的反革命集团所控制，还对414派的学生、干部、教职工任意抓捕毒打，最后悍然挑起清华园大规模武斗，文武两手并用，妄图摧垮414，一统清华。

这就是本书所收文章的背景。

我们要特别感谢唐金鹤校友，本书的大部分文章，都可以在《倒下的英才》一书中找到，我们有的是全文引用，有的部分引用，也有的经唐金鹤同意、联系原作者后以原作者署名；唐金鹤校友十几年的辛勤劳动，收集的大量资料成为本书的基础，我们是把《倒下的英才》中散在的团派极端分子暴行文字集中起来、再增加部分唐书没有的内容，一并展示给读者。

我们的校友汲鹏曾经戏言：文化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普及了“蒯”字。的确，文化革命中的蒯大富，作为清华大学学生造反派的领袖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宠儿，在全中国率先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名头响亮，红得发紫；在这个过程中，蒯大富头脑膨胀，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指挥手下干了大量坏事。文革结束后的1983年，蒯大富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等三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蒯大富在法院二审为自己辩护时，否认“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并且也否认“杀人、诬告陷害”两项罪名。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指出，在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当时全称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来称“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时，蒯大富下令“抵抗、还击”，酿成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被杀害五人、轻重伤七百三十一人的流血惨案。

判决书同时指出，“被告人蒯大富诬陷原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教务处副处长李康，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文学宓、刘承娴，校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饶慰慈是‘蒋南翔的第二套班子’‘反革命小集团’，于1968年1月和4月先后将他们抓起来进行人身迫害。蒯大富还诬陷原清华大学团委干部贾春旺及邢竞侯等六个学生是‘反革命小集团’，抓起来刑讯逼供。蒯大富的打手们对文、饶等人分别采用拷打、老虎钳拔牙、往鼻孔里灌氨水等等手段严刑逼供；蒯亲自参与

了对文学必的逼供。在残酷的肉刑折磨下，刘承娴被迫害致死，饶慰慈被打成重伤，一度精神失常，留下脊椎神经损伤等后遗症。在诬陷迫害罗征启等人的过程中，还株连了罗征启的父亲、弟弟和朋友，其中罗征启之弟罗征敷被用棉丝堵嘴而窒息死亡。”

蒯大富“杀人、诬告陷害”的刑事犯罪，铁证如山！

本书可以说是对判决书的详细注释和补充。

谢引麟（女）就是判决书中所称被诬陷为“反革命小集团”的六个学生之一。谢引麟在魔窟里经常被连续罚站几十个小时，最长一次五天五夜，站得两腿肿胀，晕倒在地；还被连续罚跪几十个小时；双肩被棍棒狠砸直到血肉模糊，至今都留有伤疤；长时间抽她耳光导致嘴鼻流血、牙龈肿痛、两耳轰鸣、两眼冒星；强迫她长时间双手举凳子、全身紧贴墙壁下蹲数百次直到她满身虚汗淋漓、筋疲力尽；酷刑还包括烟头烫手、折扇抽脸、垒球击身、拳打乳房、脚踢下身、扒地拷打及弹打经络穴位等，真是凶残之极！

实际上，在清华蒯大富一伙的舆论工具中，罗征启等六名干部被诬陷为“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贾春旺及邢竞侯等学生则被诬陷为“十二人反党集团”。本书收集了罗征启本人的控诉和饶慰慈女儿的血泪回忆；收集了谢引麟、邢竞侯的悲愤回忆及贾春旺对黑牢经历的谈话。此外，本书还收集了判决书没有提到的蒯大富手下任意抓人打人的若干实例，其中最恶劣的是在几个小时内把孙华栋同学活活打死。

当然，414也是文革中的一个派别，也以造反派自居，也是在文革的大环境下产生并生存，所以在思潮上414也带有“左”的色彩；在行为上也有暴力行为，这是毋庸讳言的。有些当初的四派成员至今不肯承认这一点，本书的三位编者一致认为，这只能说明这些校友对文革的反思仍然太不到位了。414派也抓过、打过清华的校级干部，也关押、批斗、殴打过支持团派观点的个别中层干部，更关押、殴打过一些团派同学和老师。414派的这些行为，同样是极其错误的，同样应受到谴责。作为414当时的头头，沈如槐、陈楚三等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向这类错误行为的受害者表示了诚恳道歉；孙怒涛也借本书推出之机向受害人表示真切的歉意。

然而，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在文革初期应运而生，深受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

的宠幸，他们不仅是中央文革的排头兵，客观上也充当了中央文革的炮灰，因此他们是文革的主流派；414派的组成及头头与团派有所区别，因而两派的内外部小环境也有所区别，导致414派思想上的极左影响与行动上的暴力倾向与团派极端分子有着程度上的迥然差别。程度决定性质，所以性质上也有着根本的区别。414派的前述暴力行为，无论是严重程度还是后果，与团派极端分子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暴行都无法相提并论。这也是为什么中整办调报字【83】3号文中，把“残酷迫害干部群众、大搞刑讯逼供”列为蒯大富团派“不少人干了大量坏事”中的第一桩坏事，而414派只是“也有抓干部和个别人殴打干部的行为”，并且团派至少34人因涉及刑讯逼供、残酷迫害干部群众、打砸抢而被“记录在案”，而414派“记录在案”的8人均与此无关。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关键在两头：一头是派头头们的态度，另一头则是具体实施者的行为。从派头头的态度看：414主要头头和团派主要头头对抓人打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从具体实施者的行为看：团派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只能以“灭绝人性”、“丧尽天良”来形容。

本书会告诉读者，即使是像清华大学这样高等学府中的大学生，一旦被错误理念所支配而迷失本性甚至失去人性时，会对自己的同学、师长凶残到何种可怕的程度！

群众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反对暴力的，尤其痛恨那些残酷的、恶性的、超越人性底线的法西斯行为；在这一点上是不分派的。当年，绝大多数群众对于清华文革中少数极端分子超越人性底线的暴力行为并不知情，或虽有耳闻，但知悉很少，甚至到现在知道得仍然不多，更不系统；在这一点上，两派也一样。

所以，虽然文革反思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但是直到现在，对于文革中残酷的、超越人性底线的暴力行为的披露与揭露、批判与谴责仍然是文革反思中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最基本的、最根本的内容。在这一点上，两派也是一样的，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并没有性质上的不同。

有一位校友这样说：“为使领袖脱罪而把一切坏事推给下面，那是卑鄙；为证杀人凶手无罪而归于上面唆使，那是无耻。”

胡鹏池和但粲在《清华七二七事件》一书中这样说：在欺骗面前，我们或许会迷惘；在暴力面前，我们或许会软弱；在潮流之中，我们或许身不由己；但

在任何时候，我们绝不能做超出人性底线的事。

本书正是对清华文革中残酷的、超越人性底线的暴力行为的披露与揭露、批判与谴责。

## 一、三大冤狱

自1967年下半年起，蒯大富一伙极端极左分子陆续在清华园炮制了三大冤狱，设置了规模庞大的专案组，在清华许多楼馆及校外的200号建立了若干黑牢，很难将这些黑牢比作“古拉格”式、“渣滓洞”式、“白公馆”式——都像都不像，蒯氏黑牢的黑暗、残酷的程度比起中外历史上这些著名的黑牢、集中营往往有过之无不及，故称《清华文革蒯氏黑牢》。

这“三大冤狱”是：

- ① “蒋（南翔）刘（冰）反党集团”以及所谓“第二套班子”；
- ② “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
- ③ “十二人反党集团”。

这三大冤狱的受害人，并非每个人都有本人或他人记述当年被迫害情形的回忆文字，所以本书只包括了部分受害人本人的回忆，还有子女的回忆和友人的访问记录；有一些文字是第三者的评述，也有一些受害人的被迫害情形书中没有文字反映，这是本书编者的无奈，也是我们最大的遗憾。

除了这三大冤狱，揭露蒯大富团派少数极端分子其他凶残暴行的文字也收入本书。

## 二、组织机构

团派直接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其总部核心成员陈继芳（女），陈继芳领导的“干部办公室”（简称“二办”）则是归口机构。

作为兵团总部一把手的蒯大富也直接指挥、过问“二办”工作。据蒯大富本人回忆并确认，团派抓人一般都是由他指使或点头认可的。<sup>1</sup>

制造三大冤狱，主要策划者是蒯大富和陈继芳；具体执行过程，抓人以团保

---

<sup>1</sup> 蒯大富口述回忆《潮起潮落》中说：“当时清华井冈山下面有保卫组和专案组，抓人一般都是我下命令抓的。”

卫部为主，刑讯逼供则由团专案组实施。

团保卫部是当年蒯大富手下专门从事打砸抢抄抓的部门，“捉鬼队”就是团保卫部的骨干。从骗抓骗斗王光美（按：1967年1月6日，“捉鬼队”采用欺诈手段把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骗到清华批斗）开始，以后在各种场合甚至会场上，团保卫部肆意殴打不同观点的同学、干部、老师，直至入室入户抄家、抓人，校内校外绑架，恶行累累；收入本书的部分文章，还揭露了三大冤狱之外的一些受害人被团保卫部绑架、毒打的暴行。

三大冤狱的受害人，也基本是团保卫部（本书收录的文章中常常习惯称之为“团保卫组”）出手抓捕绑架的。

三大冤狱的受害人被抓后，就由团专案组接手。

对“蒋刘反党集团”以及所谓“第二套班子”，蒯大富团派设置了“刘冰专案组”“吕应中专案组”等；对“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和“十二人反党集团”，则设置了“罗文李饶专案组”，其下对“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分设罗征启、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刘承娴等五个专案组，对“十二人反党集团”则专设“贾春旺及邢竞侯等六个学生专案组”。

蒯大富一伙制造“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和“十二人反党集团”后又升级，把414的一号头头沈如槐及另几位主要头头加进来，合称“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目的完全是为了打击文革中的对立面414派，并将这两大冤狱共六个专案组统一称为“罗文李饶专案组”。

团派界定的“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由六人组成，除罗征启、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刘承娴外，另一个成员徐一新一直在科学馆没有被他们抓到，所以并没有设“徐一新专案组”。

“十二人反党集团”，专案组由于只抓捕、关押了七个人，所以称其为“贾春旺及邢竞侯等六名学生专案组”，贾春旺不是学生，而是当时清华团委的干部。

1983年11月底，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整办”）调查组发出调报字【83】3号文，指出：根据北京市委的调查，清华团派“不少人干了大量坏事”，排在第一的坏事就是“残酷迫害干部群众，大搞刑讯逼供”；文件中关于清华“文革”期间两派群众组织的资料，列出了两派“问题较多的”机构，团派的第一个就是“罗文李饶专案组”，附件中还简要记述了团派少数打



手的毒刑逼供手段。本书全文公布了调报字【83】3号文件涉及清华的内容。

“罗文李饶专案组”规模庞大，多达100余人。资料指出，这个专案组“按人头分成六个小专案组和专门打人的凶手班子，即专案组内的‘保卫组’。采用极凶残的手段毒打、用老虎钳拔牙、烟头烧脸、灌氨水等残酷手段，严刑逼供，造成2人死亡，数人重伤致残的严重后果。该专案组的直接主持者为团总部核心成员陈继芳，组长王子瑜，副组长王良生、王士元”。

专案组内的保卫组，其主要工作是负责武装保卫团派私设的“监狱”，同时也直接参加“专案组”的审讯工作，并在审讯时充当打手。<sup>2</sup>

### 三、四大“黑牢”式的集中营

团派将抓捕来的受害人关押在清华大学生物馆、化学馆、200号（位于昌平，清华大学的原子能基地，文革前改称试验化工厂，对外称200号）、三堡（位于延庆，清华大学的教工疗养院）。这是四个相对人数较多，关押时间较长的地方。

此外，在学校的其他楼馆，如一教（第一教学楼，团派前哨广播台所在地）、甲所（团派保卫组与工总司所在地）、乙所、丙所，学生宿舍2号楼、11号楼、13号楼以及414撤出后的12号楼都曾经成为团派关押折磨受害人的地点。刘冰曾被关押在旧水利馆楼上。

团派在校外也设有临时“监狱”，如北航（北京航空学院，现称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宿舍与厕所<sup>3</sup>、先农坛国家和北京体育代表队所在地的地下室、厕所<sup>4</sup>。

### 四、“法西斯”式的拷打刑讯手段

从本书中受害人的控诉，读者难以相信，团保卫部拷打和团专案组刑讯受害人的手段如此残忍，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常用的方法有：

<sup>2</sup> 孙耘在《我的文革心路历程》一文中谈到团派的“专案组”：“在‘解放干部’方面，陈继芳领导下的‘第二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此外还有一些专案组，比如，斗蒋兵团、八五支队、九六支队、吕应中专案组等。我负责联系其中几个专案组。‘九六支队’专搞谭浩强、罗征启等干部专案，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演化成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罗文李饶’专案组。”见孙怒涛著《良知的拷问》。

<sup>3</sup> 刘冰、邢竞侯回忆都曾转押北航，谢引麟回忆曾在北航一个洗澡间的厕所里坐了四天四夜。

<sup>4</sup> 见罗征启回忆录《清华文革亲历记》。

“贴饼子”：几个打手抓住受害人四肢抬起、高举过头，然后猛向地面摔下；毒打：除了拳打脚踢、打耳光外，还有带工具的毒打。工具有：皮带、皮管、手电筒、木棍、铁棍、方木、钉有长钉的木板和木棍；鞭子抽全身；铁丝拍子抽脸；扇柄抽脸；棍子砸肩；垒球砸身；强迫脚后跟靠墙下蹲；头撞墙；钢丝钳使劲夹手指；皮鞋踩捻手指；钢丝钳拔牙；由于年轻人的牙床比较结实，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就往往演变为用钢丝钳把受害人的牙齿掰断、夹碎；烟火烧手、烧脸、烧脖颈；往喉咙里灌氨水、灌开水；罚站：罚站的时间有的长达3天3夜、5天5夜、7天7夜；有的罚站时还逼受害人双手举物、靠墙直立等；罚跪：罚跪时间长达几十小时；污辱女性：对女性打乳房、踢下身、个别受害人甚至遭遇木棍捅下部；受害人被单独关押，长期监禁，窗户都用木板钉死，不见天日。

## 五、触目惊心的后果

凡被团保卫部或少数极端分子绑架殴打、以及在蒯大富“黑牢”中被非法关押的受害人，无一不受到肉体与精神上的严重伤害，甚至波及受害人的亲属朋友。

造成三人直接死亡（罗征启的胞弟罗征敷，孙华栋，刘承娴），一人间接死亡（罗征启的朋友林维南之母林婆婆），数人致残（如饶慰慈被打烂半个屁股，右耳耳膜被打破、脊椎神经损伤）、数人留下终身病痛（如文学宓被掰断3颗牙，终身内脏受损、终身脊椎神经受损；罗征启肝被打破，只剩外面一层膜未破；李兆汉肋骨被打断、终身未愈），数人自杀未遂（如刘承娴跳楼受重伤、谢引麟触电自杀未遂、黄安妮也曾想自杀）。

## 六、主要受害人的抓捕时间及关押时间

### 1. 三大冤狱受害人

#### (1) 所谓“蒋刘反党集团”和“第二套班子”

①刘冰：校党委第一副书记，被称为“蒋刘反党集团”的“黑副帅”，1967年10月下旬被关押，68年8月9日释放，共计约290天；

②吕应中：校党委常委，试验化工厂党总支书记，被称为“第二套班子”的“黑少帅”，1967年12月4日被绑架，68年8月9日释放，共计249天。

#### (2) 所谓“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

③罗征启：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被诬为“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分子”，并被封为“第二套班子的头面人物”之一，1968年1月30日被绑架，3月27日成功越狱，共计58天；

④文学宓：校党委统战部副部长，1968年4月14日被绑架，8月4日左右被送北京市公安局，共计约112天；

⑤李康：教务处副处长，1967年12月底被关押，8月4日左右被送北京市公安局，共计约220天；

⑥饶慰慈（女）：校党委办公室副主任，1968年4月16日前后被关押，8月4日左右被送北京市公安局，共计约110天；

⑦刘承娴（女）：校党委统战部副部长，1968年4月14日被绑架，1968年6月12日被迫害致死，共计59天；

(3) 所谓“十二人反党集团” ⑧贾春旺：工程物理系教师，校团委学习劳动部副部长，被诬为所谓414的“12人中央首长专案组副组长”，1968年3月27日被绑架，68年8月4日左右被送北京市公安局，共计约130天；

⑨邢竞侯：1968年3月16日被绑架，68年8月9日被释放，共计146天；

⑩谢引麟（女）：1968年5月8日被绑架，8月9日被释放，共计94天；

⑩黄安妮（女）：1968年5月8日被绑架，8月9日被释放，共计94天；

④张琴心（女）：1968年5月9日被绑架，8月9日被释放，共计93天；

⑩董友仙（女）：被绑架具体时间不明，8月9日被释放；

⑩楼叙真（女）：1968年7月28日被绑架，8月9日被释放，共计12天。

## 2. 本书中涉及的其他受害人（以被抓、打时间为序）

(1) 唐海山、李兆汉：1967年12月5日被打；

(2) 卢振义：1967年12月6日被打；

(3) 陈楚三：1967年12月21日被抓、打；

(4) 罗征敷：1968年4月3日被抓、打，折磨致死；

(5) 杨津基、顾廉楚、王遵华（校党委委员、电机工程系党总支书记）：1968年4月前后被关押，7月28日在十二号楼被工宣队发现，误认是团派“黑高参”而带到主楼，8月9日释放<sup>1</sup>；

<sup>1</sup> 见本书《杨津基、顾廉楚、王遵华先生文革蒙难记》。

- (6) 周坚、张南清：1968年5月2日被抓，5月16日释放；
- (7) 孙华栋：1968年5月14日被抓，毒打致死；
- (8) 和统：1968年5月28日被抓，7月初释放；
- (9) 李作臣：1968年5月30日被抓，7月初从11号楼垃圾通道逃出；
- (10) 周天麒：1968年7月21日被抓，7月27日趁乱逃离十二号楼。

## 七、其他被抓打、被关押人员

### 1. 工宣队进校（7. 27）时趁乱逃离十二号楼关押地的人员

- (1) 在“5. 30”守卫东区浴室的王学恭、苏鹏声等十七名414同学<sup>1</sup>；
- (2) 吴麒、阎石、王竹茹等老师。<sup>2</sup>

### 2. 工宣队主持下8月9日释放的被押人员

工宣队主持两派谈判时，团派提供的被押人员名单上共有28人，<sup>3</sup>除了前述仍被押的13名三大冤狱受害人之外，还有以下15人：

(1) 被打成“蒋刘反党集团”的“主将”的校级领导干部：艾知生（校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2) 被列入所谓“第二套班子雏形”的中上层干部：滕藤（校市委常委、工程化学系党总支书记）、李恩元（校市委常委、监委副书记）、李传信（校市委常委，无线电电子学系党总支书记）、余兴坤（校党委委员、工程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所谓“第二套班子的头面人物”何介人（校党委委员、教务处副处长）；

(3) 其他“走资派”：邵斌（蒋南翔秘书）、解沛基（工程力学数学系党总支书记）、林泰（校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4) 两名414派学生：414总部委员吴栋、动农系414分部负责人李元宗，均在5月29日被抓；

<sup>1</sup> 见苏鹏声《5. 30武斗中的浴室守卫回忆》，载于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东区浴室被抓414共21人，因伤重先后被送医3人，余18人中，李作臣被单独关押在11号楼，7月初逃出，故7. 27从12号楼关押地趁乱逃离的是17人。

<sup>2</sup> 苏鹏声回忆：“在十二号楼关押的老师，我见的有，自动控制系的吴麒（教授）、电机教研组的王竹茹（实验员）、电子学教研组的阎××（名字忘了）”；和统回忆，在十二号楼被关押时“见到我的导师吴麒，好友电机系教师阎石，还有老四守东区浴室被俘的人员。”见陈育延回忆录第十六章《清华两派最后的谈判》。

<sup>3</sup> 见陈育延回忆录第十六章《清华两派最后的谈判》。

(5) 两名《红教联》骨干：陶德坚（女）、朱启明；

(6) 两名所谓“特嫌”：何成钧、何增禄。

### 3. 其他曾被团派抓打、关押过的人员

据邱心伟、原蜀育《大事日志》载，早在1967年4月17日，即414串联会成立仅仅三天，其主要负责人沈如槐就遭到团派殴打，7月18日再次被团派殴打；10月19日，团保卫组抓走414总部委员周泉纓并毒打；10月20日，团保卫组绑架、殴打《战地黄花》战斗组成员李向东后，又把要求放人的414总部核心委员宿长忠毒打至重伤（脑震荡，髌骨、肋骨骨折）；12月5日，团保卫组将414总部委员郭仁宽毒打致肾出血。

据不完全统计，4.23武斗之前，有记载的414派同学和支持同情414的老师、干部被打被抓约35人；截至6月11日，“团派已扣押四派70多人”。

就在7.27当天，工宣队进校解救科学馆的100多名被困414人员时，团派还趁机绑架了刚从科学馆出来的校医院张寿昌并毒打致其住院；第二天，团派又在北航绑架了楼叙真。

除了上述张寿昌大夫和沈如槐、宿长忠、郭仁宽、周泉纓、李向东外，《千钧棒》的胡逢淦被团保卫组打成鼻骨骨折，《战地黄花》的朱绍琴被抓，打成脑震荡，还有许多我们不知姓名的414同学被抓被打。甚至有来串联的外地学生和北京中学生，也被团保卫组“怀疑是‘特务’而严刑拷打”。<sup>1</sup>

曾被团派关押过的干部、教师、职工还有：蒋南翔（高教部长、校党委书记、校长）、何东昌（校党委副书记、教务长）、凌瑞骥（校党委委员、自动控制系党总支书记）、郝根祥（校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兼保卫部长）、张慕津（校党委委员、校团委书记，团中央委员）等。

汪建君、王振通及其美籍夫人，《红教联》的不少成员也被团派保护性关押。



<sup>1</sup> 见张比《记录在案：误入白虎节堂之后的黥面之刑》：“被列入专案组、文攻武卫指挥部及武斗队、保卫部、杀人凶手类别里的人，行为极端，十分凶狠，调查报告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而且还有些没有全部列入（如团派中的某些人对来串联的外地学生和北京中学生，怀疑是‘特务’而严刑拷打）”；载于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1319页。

## 【书讯】

## 文青著《不周山下》在美出版

### 文革历史 · 家庭实录 · 长篇小说



ISBN: 978-1-951135-90-4 (Print)

978-1-951135-91-1 (Ebook)

书名: 不周山下 Under Mount Buzhou

作者: 文青 Wei Qing

出版: 美国华忆出版社 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USA

版次: 2021年9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字数: 324千字

售价: 26美元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LCCN: 2021 918757

##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中共一高级干部家庭在文革中的变迁为线索，着重描写了文革给一家人的生活、命运、思想、信念带来的冲击和变化。故事主要围绕着化工部副部长陈辛吾、妻子某化工厂的党委书记李伟玉以及他们的五个孩子，其中三个大的分别是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在文革中的经历展开。

陈辛吾和李伟玉都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陈辛吾是典型的党内知识分子干部，性情严谨、老练，严于律己，做事进退有余，不仅有专业知识，而且工作认真负责，能力强，因此提拔得很快。李伟玉则是不甘心做太太，事业心强，性格豪爽、刚强的知识女性。三个孩子也各有突出的个性：老大是学习尖子，北大的高材生；老二既聪明又颇具叛逆性格；老三一方面性情愚钝，另一方面又具数学才能。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原本就有一些正常的磕磕碰碰，但到了文革时期，一切都被打乱了。

本书主要描写了文革最初的三年。从1965到1968年，即从文革的前奏开始写起，到红卫兵造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被打倒，至上山下乡，将书中人物带过一系列历史事件。

在这场运动中，他们或身不由己，或推波助澜，或困惑不解，或欣喜若狂，或在青春躁动中做出非理性的举动。其中每个人物又都有自己的感情纠葛和生活经历，以及自己的性格逻辑，和绕不开的归宿。

文革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命运、生活的改变，不仅仅让人看到世态的炎凉——这样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期都会发生，更重要的是信念的全面的坍塌。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只是层面不同，认识不同，结果不同而已。这种观念的、信仰的变化对整个社会发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而且它给人带来的痛苦、困惑、思想动摇甚至比肉体伤害、家破人亡还要严重。❏

## 作者絮语

文化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段历史。时间过得久了，这段生活似乎就被淹没了。好像不承认，不面对就可以忘却，忘得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回事，或者即使有这么回事，也只是个大概，只是个名词，只是史学研究的对象，只是个历

史的偶然，生活的偶然。似乎我们没必要再讲述，再向任何人做任何交代，更不必让后代知道当时都发生了什么，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就让它像一个历史的真空，一个模糊的概念，不必细看，也不必深入地了解，匆匆翻过就是了。

那段生活像是一大块伤疤，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荒谬、残酷却又真实的故事，没人愿意揭开这块伤疤。揭开它，确实让人疼痛难忍。但是，它已经烙印在整整一代人的心灵上，已经刻进他们的性格中，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同时还传给了下一代。

因此，这段生活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埋没。这段生活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研究的重大课题，也应该是文学表现的主题。如果不真实地再现那段生活，历史是不能宽恕我们这些“当事人”的怯懦、苟且和不负责任的。❏

## 【思想文化】

# 伤痕的治愈和社会灾难的“他纠”机制

安希孟

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灭绝大屠杀。十年后，不是卢旺达人的比利时政府首相伏思达表示歉意与反省：因为他们未能制止大屠杀。这种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态度受到国际社会的如潮好评。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长也向卢旺达人民道歉。安南呼吁世界人民在4月7日为卢旺达遇害者志哀一分钟。中国至今没有为文革死难者志哀一事。中国的十年“浩劫”中国国家元首、元帅惨死，总理多次被迫检讨，部长、省长死于非命，至今未见各国贤达之士、哲人文魁、政坛巨擘为当年未能批评阻止此事表示歉意。“浩劫”比大屠杀、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在哲学宗教意义上更惨烈。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世界级人物或国际社会组织对中国良民与无助者表示歉意。难道以刘少奇主席、彭德怀贺龙元帅为首的包括阎红彦吴晗翦伯赞李达在内的亡灵的尊严不比卢旺达人民更能激起国际社会的关爱吗？我们至今也没有人想到傅聪“叛逃”他国的意义，没有人想到张志新遇罗克等人之死的意义。我们没有想到人类共同体是否可以拯救生灵。人类而今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德国政府多次为“二战”表示忏悔，但日本许多政要仍旧参拜安放“二战”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中国的文革纪念馆难以建立。



我们依然清醒地记得：粉碎“四人帮”是执行毛主席的“遗志”，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令人有些酸楚和苦涩。我们的哲学告诉我们，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世界这个外部“原因”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然而“内因”却的确酿造了苦酒——这杯苦酒（鸩酒）是给中国人民及其儿子刘邓陶贺彭陆罗杨彭黄张周们喝的。今天，“内因”一词应当理解为是世界人民共同体而不是太空来客与火星人。我们不当陶醉在“自己”的胜利中。

有一篇记述我们景仰的陆定一先生叙谈的文章说：他一是严厉批评文革，把它与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并列，指出其手法都是愚弄民众、鼓吹狂热、迷信崇拜等等。（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人类的“恶”从根本上是一致的，正如“善”并不分东方西方、中国外国一样）但他同时强调：“希特勒的‘文化大革命’，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是靠外力制止的，即是靠世界人民的力量制止的；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制止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二是合理解释文革，视之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成熟的表现。（单世联《中华读书报》文）

陆定一把中国文革与希特勒的“文化革命”相提并论，完全正确。他认为，希魔与日帝的“浩劫”是靠外力制止的，中国的文革却是靠中国人民自己制止的。对此，我们应当有所补充：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无所谓内外之分。天安门城墙上“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文革中我们就知道“世界人民心向天安门”，“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世界人民未能制止中国人的集体迷狂和受难。“文化革命”的前提是自我封闭，与外部隔绝。如果当时国外联系多一些，对外部的依赖程度大一些，文革的灾难和唐山大地震的损失就会小一些。世界各国的报章及学者将会做出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举动。

希魔与日帝对外侵略征服奴役扩张，但并不对族内警内民内政内进行残酷斗争。文革则是对党内革命元老进行打击。然而，文革这样的浩劫也理应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正义力量的谴责和反对。文革是中国人整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整日本人。中国的文革如果没有受到外部力量的反对，那是人类的悲惨和不幸。如果外国的报纸电台批评谴责和反对中国的文革，那对中国人会是一剂良药。我似乎知道文革中有人窃听外台也过早地醒悟了（我浙江、四川的同学因“偷听”敌台获罪）。中国的文革是全民迷狂，这是最大的不幸。但那时世界各

国政要却头脑清醒。文革是一个“关门打狗”“闭关锁国”的时代。如果说国外先进人士未能谴责和阻挡对刘少奇进行批斗，未能对刘少奇加以保护或提供避难，那是世界人类纠错机制不完善的表现，是人类的集体耻辱，是人道力量的软弱和失败，是人性的弱点。世界文明未能使中国人民免受浩劫及牢狱之灾，这是世界文明和人类历史的污点，而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不幸。

说文革是由中国人民自己纠正的，这很正确，但也不完全正确，因为中国人民毕竟没有阻止文革的发生，毕竟集体起哄酿成了几亿人民自己的灾难。因而也可以说，中国人民未能阻止灾难。不仅如此，反右、肃反扩大化、大跃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四清等运动，也是中国人自己发动的，而不是由反对中国的“帝修反”发动，不是由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动的。可是，如果当初外国的领导人和哲学家们批评文革，那我们又将如之何呢？我们今天会心存感恩地承认他们是“先知”吗？可能我们还没有从“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陈伯达）的梦魇中清醒过来。

文化革命是由中国人自己发动、自己制止的，这的确可以使人自豪而骄傲。但若是在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些人要发动文革浩劫，可能会有另一批人制衡反对。如果美国有一批人上街喊“打倒（美国的）刘少奇”，可能那里会有另一批人同样上街喊“反对打倒刘少奇”。这样，美国的文革可能发动不起来，因而也就不存在平反、昭雪、否定、推翻诬陷不实之词，也不存在抓“四人帮”（到秦城监狱）或结束“十年动乱”的问题。这似乎是挽救了“四人帮”而不仅仅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因此，自己发动，自己纠正，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当我们集体迷狂地犯错误时，如果别国人民起而批评，如果别国人同情我们的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这同样是人类文明自我纠正。我也想，如果白皮肤、黑皮肤的人发动文革，可能列国舆论会起而批评并为受害者提供庇护。

陆定一又说，文革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成熟的表现”。但如果权力得到制约，领袖的权力受到限制，很可能不成熟的领袖与政党也发动不了这样的浩劫——举世各国政府都有其零岁、一岁、二岁……的执政经历，但未必都能有力量搞文革。也有的政党尽管执政多年，已经成熟、衰老、壮大，但至今仍把领袖当作太阳、父亲，搞子承父业，搞嫡传，搞夫妻店（齐奥塞斯库），培养接班人。这个世界上仍有“成熟”的政府在搞个人独裁、兄妹开荒、夫妻作坊、兄弟

公司、家族世袭！我不大赞成说我们“年龄”小才犯错误。须知我们常说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比美国长），从尧舜禹夏商周就有了文明。我们自己“不成熟”没关系，但“世界已经长大成人”（朋霍费尔），人类已经脱离上帝而独立行走。上帝让人类自行解决问题。人类自身会制止“浩劫”的发生。

笑蜀在《湘声报》上发表《权力、人性、政治动物》，提到苏联“政治绞肉机”，认为它是权力逻辑对生命逻辑的侵害。一架政治机器无法从根本上自我纠正，也许外力能使机器变好！文革是体制的必然产物（似乎有些地方必然地发生如此清洗和浩劫）。看来文革有其必然性，而人类当时缺乏纠错的机制。

因此，把文革归咎于四个人，归咎于“不成熟”，只能使全民缺乏自我反省，这正是民族的悲剧。说实在的，在文革中我们这一代红卫兵比毛泽东及中央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有一个红卫兵现在说自己“清白”，就有点虚伪。文革红卫兵是从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师大附中开始的。我曾看到北师大附中的小将们比北师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更有斗争勇气。有一次他们抢占北师大电台骂北师大学生是狗崽子和修苗（修正主义苗子）。那时女红卫兵说“他妈的”就像现在说“您好”一样。但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却说北京“西纠”（北京西城区中学生纠察队）了不起：

1966年8月6日，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紧急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行为。8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战报》严厉谴责打人抄家以及对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势力论处的行为，要求红卫兵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十六条》。首都西城区几十所中学红卫兵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西纠”在其活动的一个多月中陆续发布了十几个通令。这些通令对保卫党政机关，保护革命干部，保卫国家机密，维护社会秩序，以至保护民主人士，都做出了详尽的规定。

“西纠”竟有如此辉煌的战斗历程！文章简直是在深情地回忆文革红卫兵火红战斗岁月，甜蜜而温馨。然而文章对“西纠”的评价太高了，似乎我们年轻的娃娃们当时是在“纠正”文革错误！红卫兵和纠察队都是违宪的发明。我不禁要问：他们捍卫和宣传的“十六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件？它难道不是“红色风暴”的风源吗？它难道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吗？全面武斗难道不正是“十六条”的产物吗？“西纠”是有权发布通告通令的国家机器吗？它有什么权力对

保卫党政机关，保卫国家机密做出规定呢？这本身是全面混乱、全面内战时期的怪胎，然而却得到喝彩！据我所知，“西纠”与“联动”，实即一具有错误性质的群众组织。我认为，我们应当反省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而不是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文革前，那时的人们只知批判别人，结果后来自己也受到清算。

看来，“西纠”乃是当时一批搞个人崇拜的幼稚的高干子弟和娃娃们为社会添乱且制造伤痕的人。在当时真正纠正文革的人为数甚少，且难逃整体背景上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如张志新）。我现在不知道当时人类社会和国际人士是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纠”——这想法太奢侈，太天真了。不过我还是可以被允许设想当时人类的“自纠”和“他纠”的。

唐山大地震若发生在今天，中国会邀请各国共同抗震救灾。同理，若是在今天发生文革，会有世界人民共同纠正。这就是人类的“他纠”机制。因而，情形很可能是我们对文革的教训并没有真正加以吸取，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文革发生的社会条件，有赖于我们融入国际社会，树立环球观念和世界人类一体化思想，有赖于政治民主与人权保障，有赖于我们与国际社会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国际社会、万邦联盟、万国公会、世界人民、国际工人运动、全世界无产者没能大声呼吁制止浩劫，整体沉默，集体消音，是人类原罪。

欧洲中世纪农奴若逃亡到城市满一年零一天即可获自由。民主与法制为政治逃亡和政治庇护开了一道光明之门，成为真正的“逋逃薮”（指藏纳逃亡人的地方）。这是国际社会与人类的共识，即“自纠”或“他纠”机制。各国文化都不简单地以“逃”为罪。逃难、逃荒的逃避行为乃是一项天生的权利与本能。今天我们对乞讨者已不一律抓获、遣送，而采取救助办法。中国自有洋传教士进来，就有了对灾民、难民的救助措施。当然，这不是说对负案在逃的官吏可以庇护藏匿。各国对大贪官、大毒梟通缉合捕，乃是“他纠”或“自纠”的另一种表现。不过对政治流亡者（如对列宁、对初期国际共运活动家、对巴黎公社的流亡者）之庇护，至今仍是无可指责的。这是人类的“自纠”。汉文中的“逃秦”，即指逃避秦火，犹言避乱，天经地义。“老夫逃世久，坚坐听阴晴”，有隐居之意。我们今天为国际社会未能给刘少奇提供保护，深感遗憾。■

【百年中国】

## 旋律：生命中的记录仪

——六十年代初中教室里的歌声

马昌海

1963年，我们踏进了北京八十中的校门。入学不久，班主任李文英老师找来一首歌曲《在老师身边》，由懂音律的王宝珍同学用毛笔大字抄录后，置于黑板旁，教大家学唱。歌中最后唱道：“将来会有那么一天，我们要走得很远很远。告别了亲爱的老师，告别了我们这熟悉的校园。带着老师的深切希望，去把少年时代的理想实现。到那时候我们的思念，还会飞到老师的身边。”在后来天各一方、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每当回想起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这首歌就会油然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与上小学时不同的是，课间常常会有同学唱歌。有着一副嘹亮歌喉的叶钟魁唱的最多：《克拉玛依之歌》；《大顶子山高又高》；《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乌苏里船歌》；《新货郎》；《越走越亮堂》；《我爱祖国的蓝天》；这些当年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是听叶钟魁唱会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中的《高原之歌》《怀念战友》等，也是叶钟魁首先唱起来的。叶钟魁在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最后一句：“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的最后两个字时，还腼腆地使用了含糊不清的语音。有一天，张旭东唱起了一首《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那时候，能够在教室里唱起别人不会唱或没听过的歌曲，是歌唱者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其他同学会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静静地听着他引吭高歌。

影片《碧海丹心》上映后，张春林唱起了激越的主题歌《钢一连连歌》，同学们齐声附和：巍巍井冈山，养育着钢一连，毛代表就在我们的身边，朱军长走在连队的前面，嘿，走在前面。我们来自南昌城下，我们来自湘江两岸，为了红色政权，和白匪军决一死战！

影片《李双双》上映后，任茂森在课间唱起了《李双双小唱》，但他把“她是咱们妇女的好榜样”唱成了“她是你们妇女的好榜样”，因为男生不能说“咱

们妇女”如何如何。张慧琪也经常在校间哼唱，比如：人将毛主席著作比太阳，我说太阳比不上，比不上。太阳上山又下山，毛主席著作日夜放光芒。哎嗨哎嗨哟，太阳上山又下山，毛主席著作日夜放光芒，日夜放光芒。人将毛主席著作比海洋，我说海洋比不上，比不上……”；“什么钥匙开什么锁，呃什么阶级读什么书，毛主席给咱写的革命的书，……”；“湘江啊水呀流滔滔，南岳高峰入云霄。人民战士欧阳海呀，舍身忘己风格高……”；还有歌颂大庆油田艰苦创业的：“干打垒呀干打垒，干打垒呀干打垒，一座座土房是大庆的里程碑呀嘿哟”。喜欢唱歌的还有潘淑玲、范珏等很多同学。有一次，王宝珍唱起了马泰的评剧《夺印》或《阮文追》，好像是前一天广播电台刚刚播放过的。叶钟魁、任茂森等多人马上附和。一时间，教室里抑扬顿挫的评剧声此起彼伏。在这以前，我对北方戏曲很不熟悉，听得好奇：怎么都喜欢这一口？



初一的时候，我们排练了一首影片《花儿朵朵》的主题歌《花儿朵朵向太阳》。由于无力统一着装，就要求女生一律穿紫红色的灯芯绒上衣，到日坛公园参加了朝阳区歌咏比赛，由叶钟魁和王宝珍领唱，王宝珍手风琴伴奏。歌中唱道：“花儿离不开土壤，鱼儿离不开海洋。少年儿童千千万万，离不开亲爱的领袖，离不开亲爱的党。朵朵花儿向太阳，颗颗红心向着党，星星火炬指引着我们，从小立下大志向。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献出一切力量！”。而产生领袖和党的土壤和海洋从何而来？却没有想过。这是演出后在校园的合影。

初二时，我们排练了一首歌《伟大的祖国》（贺敬之词，李焕之曲）：

红日出东方，光芒照四海，伟大的祖国，顶天立地站起来！巨人的双手，英雄的气概，把万里江山重安排，重安排。看春满江南，花开塞外；千种奇迹，万道异彩。三面红旗迎东风，革命风雷滚滚来！啊……我们伟大的祖国，前进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党，带领我们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昆仑高上天，大江入东海，伟大的人民，革命壮志满胸怀！那时代的逆流，

脚下的障碍，怎挡我革命大军向前开。看多少个大庆，多少个大寨，英雄的前辈，英雄的后代。千万个雷锋又站起，一代新人接班来！啊……我们伟大的祖国，前进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党，带领我们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大地起风雷，万里云雾开，伟大的祖国，把反帝大旗举起来！看牛鬼蛇神，正节节溃败，东风浩荡，西风衰，西风衰。我们肩靠五洲，心连四海，全世界的朋友四方来。被压迫的兄弟团结前进，胜利的明天就要到来！（副歌二部合唱）：啊……我们伟大的祖国，前进在世界革命的新时代！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党，带领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未来！

这首歌由王宝珍教唱并手风琴伴奏，到学校参加演出还得了奖。这应该是反映当年时代风貌的一个代表作：歌颂党和毛主席，三面红旗，大庆、大寨，雷锋，东风压倒西风，世界革命……都提到了。词曲作者都是一代大家。

初三时音乐课没有了，但文艺委员王宝珍教唱过不少歌。有一次教唱一首《高举革命大旗》：“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是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不怕千难万险，不怕山高海深，高举革命的大旗，巨浪滚滚永不停……”。刚教了两遍，我就乱喊：都会了，不用教了！王宝珍被噎得一时语结：会了？那你唱一遍！我立即大声唱了起来，王宝珍看着我无可奈何。其实我也只是会唱头两句，纯粹是捣乱。

后来我和孟庆璞等同学还排演了一个男声小合唱《等待出航》，是影片《赤峰号》的插曲。

当时只要广播电台播送了什么歌曲或新上映的影片里有什么插曲，马上就会在教室里的课间听到。比如《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战士歌唱东方红》《我和班长》《手拿枪心向党》《壮锦献给毛主席》《勘探队员之歌》、《公社的日子万年春》，《爱社歌》，《众手浇开幸福花》，《一条大道在眼前》，《社员心向共产党》，《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学习那英雄的解放军》《雷锋我们的战友》《王杰的枪我们扛》《红旗颂》；《牢记阶级仇，紧握手中枪》；《学大寨，赶大寨》《敢教日月换新天》，1965年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团体操《革命赞歌》选曲《丰收歌》《翻身农奴把歌唱》《一代一代往下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风雷之歌》《把列宁主义大旗高高举起》《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全

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影片《铁道游击队》《红色娘子军》《地道战》《地雷战》《苦菜花》《红日》《英雄儿女》《汾水长流》《天山的红花》《军垦战歌》《怒潮》《女跳水队员》《年青的一代》《青松岭》的插曲等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长征组歌》中所有的歌曲，我们都耳熟能详。

王宝珍后来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理论作曲专业被录取。春风得意的她在教室里给我们讲述了考试的经过，除了考乐理知识，钢琴、手风琴演奏以外，还当场出题作曲。王宝珍于是将她自己谱曲的第一首歌唱给我们听，歌词是“大寨红花”之类，但曲调好像并不动听。最终，一场文革风暴击碎了她的音乐之梦。

在文革之初，王宝珍等一伙同学居然去了拉萨。她说是四川雅安扒军车，沿川藏（康藏）公路走了6天才到达的。一路上险象环生，夜宿兵站。王宝珍回来后拿了青稞炒面，在教室里用盐与水调和了，熟练地捏成条状的糌粑，笑嘻嘻地让大家品尝。我直呼难吃，王宝珍有点尴尬地解释说，如果放了酥油会香甜一些。然后她在教室里载歌载舞，为我们表演了一首《金珠玛米到我家》。

音乐是记忆最好的连接点，这些歌曲曾在我们的心中产生过影响，又是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中创造的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原创性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情怀。我们如今并不是都认同这些歌所表达的意识形态，但它是我们生命的一种纪录。这些歌都是由我们生命岁月中比较难忘和重要的内容连缀起来的。我们在唱这些歌的时候，已经带进了自己的理解，以及纪录了我们生活的某一个阶段。这些旋律唤起的是对生命的感悟。随着音乐响起，我们会有一些特殊的感觉。青少年已随风而去，这些歌声会让我们回想起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





【百年中国】

## 画说我的一生

刘海鸥

## 15. 动摇的钢铁长城（中）

（1966年5月——1966年7月）



邮电学院的学生老韩看见我穿着军装，问军服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是杨崇寿送给我的。他说，你不应该要。不知道他是指我不应该从“群众”那里搞军装，还是我这种出身的人不配穿军装。

老韩自诩为我们这队人马的头领，他也是北大附中的，和我同级不同班。他是学生会宣传部长（我在他手下画了三年黑板报），也是班上的团干部、班主席，很有领导能力，工人出身，一身凛然正气的样子。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他，总觉得他太一本正经，正经得有些假模假式。

第二天趁我外出，老韩溜到我的宿舍偷走了军装。



晚上我从外面回到住地,发现军装不见了,别人告诉我是老韩到我宿舍拿走的。我跑去问他,他却装作不知道,又含糊其辞地说,你就别穿了。我很生气,如果你觉得我不配穿想没收或禁止我穿可以跟我挑明了说,为什么要偷偷地拿走偷偷地处理,还不敢承认呢?我对他的优越感和做事猥猥琐琐不光明磊落很为反感,不再服从他的领导,后来各走其道。



不久邮电学院的学生先后回了北京，只有我一个人留下来了。

家惠知道我一直想下专区县查看民情，就建议我们去建水。她哥哥在建水当部队卫生员。她到汽车运输公司找了一辆去建水的卡车。吴的哥哥是一个相当英俊的小伙子，简直可以说是俊美。他的相貌绝对是让姑娘心动的那种，可惜对我表现出太多的尊敬甚至是崇拜的样子，忽视了我的性别和年龄。在建水的其他战士都是这个态度，好像我是京城来的钦差大臣，对我毕恭毕敬。我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发号最高指示，弄得我简直不敢说话了。

回北京后我收到了一些战士给我的信，寄给我一张排排坐学毛选的照片，信中说他们想买手表但买不到，希望我能在北京帮他们买五块上海手表，收到表后会立即把钱寄来。我哪里办得到，一块表120元，我家的存折全部冻结，妈妈每月只有生活费25元，怎么拿得出这么多钱，那些战士把北京人都当成了大财主。



卡车还要去个旧拉货，路上司机带我们去看了一个燕子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几十丈高的天井状的岩洞里，栖息着成千上万只燕子，叫声震天，一旦飞起来，黑压压遮天蔽日。在我们脚下，则是燕子粪堆积起来的土地。



我到云南的最终目的就是去越南打仗，回到昆明开始策划越南战场之行。家惠帮忙找运输公司的“炮”派司机联系了一辆去往西双版纳的卡车，在那边再寻找越境之路。家惠也义无反顾地要和我一同上战场，我们就一道出发了。

卡车是专门为我们开的，车上还捎了十几个孩子，有几个是北京来的。我们都站在车斗里，车斗上有一个帆布篷遮挡灰土。一路上红色土壤的干尘随气流的旋涡全都扑进车斗，又闷又呛。大家争着站在靠驾驶舱的地方，可以看风景，又不吃土。

车在山里行走了好几天，山高而险峻，公路崎岖，经常连续拐十几个U字形的死弯，与对面来车擦肩而过。司机开车还很野，开得飞快。在悬崖峭壁的路上，转弯时根本看不见对面来车，只是鸣喇叭探路，速度不减。司机说他开惯了山路，有一次回北方老家探亲，在又平又直的公路上简直不会开车了。在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对面山腰上横陈着从公路上翻下去的汽车残骸，卡车公共汽车小汽车，什么车都有，不过我却从来没有担心害怕过，到底是年轻。



云南是少数民族集聚最多的省份。有一天汽车在大山里行走，正赶上“赶摆日”，十岭八乡的农民挑着背着扛着顶着货物，沿着公路上集。赶集者穿着各种不同民族的服装，虽然不似我们在电影和舞台上见到的那么簇新华丽，但也多姿多彩，煞是好看。我们尽自己的知识数着：苗族、彝族、布依族、白族、纳西族、景颇族、侗族、傣族……还有的叫不上来，从来也没有见过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在一起。



一路上整体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穷，除了那天赶摆，沿途所见多是衣衫褴褛，灰头土脸的乞丐。每个小县城或小镇子只有一条主街，街上只有零零落落的几个商店，里面除了生活最基本的需用品外什么也没有。一天在墨江停车吃饭，墨江县城一个小小破旧，大约这个地区遭了什么水旱灾，满街全是逃荒的和要饭的人。女人黑短裙、黑绑腿，男人穿黑衣服、黑裤子、黑布盘头，黑压压的一大片，与墨江的县名相呼应。饭菜一端上来，立刻被他们呼呼啦啦地围住，你还要小心护住你的吃的，一不留神东西就被抢走了。我们受不了这个阵势，吃了几口就离开了，一群人立刻扑到剩下的食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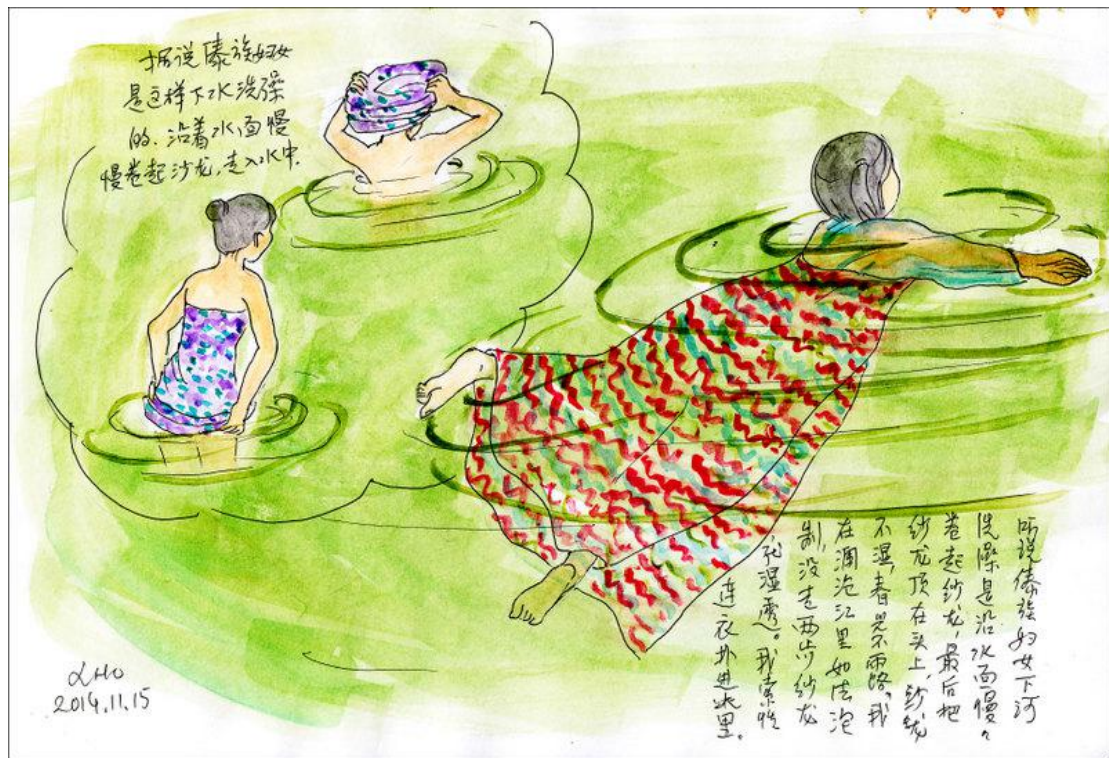


越往南走，道路越是坎坷不平，路面被援越的坦克履带压得一棱棱的，车子咯楞楞地行进，颠簸得厉害，我晕车也越来越厉害。在到达景洪的前一天，我的耐力已经到达了极限，恶心、不吃不喝，只能昏昏沉沉躺在车厢肮脏的地上，身上盖着一层红色浮土（云南的土地多是红土地）。



到景洪一下车  
就开始呕吐，一路  
上的不适立刻缓  
解。  
LHO  
2019.11.14

行程四五天，终于到达了西双版纳的景洪。下车走了没几步，就呕吐起来，吐完后觉得舒服多了。西双版纳的“西”是十的意思，“双”是二，“版纳”是州的意思，指这里有十二个州。比起内地来版纳好像是另一个世界，高脚竹楼在巨大的热带树木中露出边边角角，街上傣族女人头盘大髻，穿着薄纱紧身上衣，彩色纱笼，袅袅娜娜地走路，个个如画中仙女。这是一个让人斗志完全松懈的地方。不过，经过了那么多的紧张生活，我也乐得这样放松一下。



据说傣族妇女  
是这样下水洗澡  
的。沿着水面慢  
慢卷起纱笼，走入水中。

听说傣族妇女下河  
洗澡是沿水面慢慢  
卷起纱笼，最后把  
纱笼顶在头上，纱笼  
不湿，着凉雨路，我  
在澜沧江里如法泡  
制，没走两步纱衣  
就湿透。我索性  
连外衣也进水里。

LHO  
2014.11.15

版纳的天气闷热，每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准有一场暴雨，雨过之后气温没有缓解，仍是闷热。好在澜沧江就穿过景洪镇，可以在江里游泳。镇子上的傣族男女常在江里洗澡。女人洗澡的方式很有味道，她们穿着衣服慢慢走入水中，随着水面的高度慢慢把纱笼一点点卷起来，卷得很技术，既不湿纱笼，又不泄春光。水过胸后将纱笼盘在头顶，出浴后再按原路将纱笼慢慢放下。我借了一条纱笼，试着挽起入水，但是配合不好，纱笼很快就湿了，索性上身穿着衬衣，下身裹着纱笼扑进水里。衣服兜水，游不起来。其实我根本就不会游泳，胆子却很大，在江里扑腾了好一阵才上岸来。不管怎样，我算是在澜沧江里游过泳了。





在景洪认识了一个傣族小姑娘纳翠花，文革中改名叫纳志坚，她个子矮小，圆脸大眼睛，浑身上下都圆滚滚的，不像满街都可以看到的苗条细长的傣家姑娘。她跟我们很要好，是我们的小向导。

纳翠花带我去去了景洪最有名的佛教寺庙，那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堂皇漂亮的庙宇，现在却被外来的红卫兵造了反。佛像扳倒，佛器散了一地。地上撒满了抄着佛经的贝叶，不知道是傣文还是梵文。翠花说，拿吧拿吧，都快被人拿光了。我知道这是文物，不敢多拿，我拣了一小片夹在日记里作纪念，保留至今。

（庙堂被砸得惨不忍睹，但这幅画中画得整整齐齐，因为我不想对神灵有所不敬）



我很想看看傣家的竹楼。纳翠花带我去她的大爷家，是一个典型的竹楼，下面养着猪，上面住人。楼上的地面是竹片编的，擦得光光亮亮，屋里没有什么家具，空空荡荡。她的家人对我们十分客气，因为语言不通，我们只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怀人】

## 写给明天的纪念

——我的父亲沈力

言真



与大多数子女一样，我并不真正了解父亲，尽管非常爱他，此时此刻提到他，泪便溢上来模糊了眼，其实他已辞世二十三年。1998年，在医院父亲病榻前，他突然对我讲起了往事，他的战友们如何牺牲的，我恭敬地听但感觉很累，便说：“爸爸，我想躺一会行吗？”那时已人到中年，父亲往病床边缘挪了挪，让我躺在他身旁。十几天后，他去世，（沈力先生，1922—1998）而我，他的女儿，却不在他身边。

所以，他讲的那段往事，埋在他心里半个世纪的往事，便像遗言一样刻在我心中。

—

父亲沈力，1922年出生于河北安国县，1998年病逝。离休前任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

他上中学正赶上“七七事变”，受一位地下党老师的影响，十六岁就跟着二叔离家抗日。几经辗转，到了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巧的是在延安还碰到了那位老师。后来他离开延安，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成了一名战士。

1944年某日，他从冀中军分区驻地出发，去友邻部队平西一个武工队办事，自然是在大山中了，随武工队晓行夜宿，一天，突然发现山脚下羊肠小道上有一队日本鬼子在行军，只有十几个人。父亲血气方刚想打，武工队战士们也想打，他们眼馋鬼子的好枪想缴获几条，武工队长最后决定打。于是居高临下瞄准开枪，枪声响起，捅了马蜂窝，霎时间漫山遍野枪声爆起，到处冒出鬼子追他们。

他们只能跑，跑过一座山又跑过一座山，不知道翻了多少座山仍旧甩不掉追敌，不仅甩不掉，更严重的是每进入一座新山，都会惹起激烈的枪声迎接他们，

显然，撞到鬼子大部队进山扫荡。

实在跑不动了，已经有人受伤，在一座山的山顶，队长喘着大气，说，这么跑可不行，他与几个人开会商量一下，决定翻头返回逆着追敌插过去，天快黑了，趁夜色也许能从鬼子包围的缝隙中穿出去。全队马上化整为零，分成几组，每组二三个人，约定好了几天后的集合地点。

全部成功突围，几天后碰面时一个人都不缺，派人将两名伤员送到贝家花园贝医生处治疗，武工队则立即上路找平西主力部队报信。其间父亲病了打摆子，队长送他到山里的教堂请神父治疗。武工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部队，部队得到这个消息分析，这次鬼子这么大规模进山是要寻找八路军主力，于是决定转移下山去平原，同时派武工队先出发，过铁路线到京郊一带相机活动，搞出点动静牵制敌人。

父亲被留下随大部队行动。从此，与生死相交的队长和队员们分别。这一别便成了永诀——武工队到了海淀北边，派人去贝家花园接回伤员，其余人在苏家坨宿营等待。当晚日本军队包围了苏家坨，双方交火，战斗激烈，武工队员全部牺牲，队长被鬼子开膛。

那晚平西主力部队也已经到了平原，宿在一个叫七王坟或者祁王坟的地方，父亲他们都听到了远方的激烈枪声，不明情况，按原计划武工队应该不在那个方向停留。至天亮，枪声才渐渐稀疏，部队立即再次转移，父亲也接到命令告别这个友邻部队，回到冀中军分区原部队。



（北京房山十渡平西抗日烈士纪念馆）

后来，八路军在根据地边区，为武工队员们建了烈士墓，地处现在的十渡景区。

父亲讲这些往事时，很平静，条理清晰，很多细小的事都记得。一直到文革后期，他的一位老战友被下放到苏家坨公社劳动，麻烦缠身的父亲还不忘托付老战友打听一下当年情况，复仇心啊！真打听到了，是村里有人向日本人告密，解放后这人被枪毙。

在父亲眼里事情已经了解清楚。我却不然，想知道队长队员们，他们是谁？他们的姓名？他们有后代吗？后代们现在怎么样了？父亲一概答不上来。我退休后做了一些调查，在档案馆居然查到资料，苏家坨那次殊死战斗，史称“西埠头事件”：1944年9月4日，平郊武工队副队长齐文清带领16名队员下山执行任务，夜宿西埠头村。因敌特告密，第二天拂晓被日军包围，突围时齐文清等6人牺牲，李庆江等7人被俘，只有尹君彦等3人突围成功。

西埠头是苏家坨的旧称。

我很震惊，父亲以为全部牺牲。那么，李庆江等被俘的七人命运如何？军史记载了吗？日军伪军旧档案中存有痕迹吗？我力不从心，无法查到。

很遗憾，父亲了解的比我还少。

也难怪，那是战争年代。他们那辈人经历得太多，对待生死已经淡然。

## 二

偶尔他会笑谈解放战争时，打张家口，强行军累得快要断气，一路跑一路扔掉身上背的东西，部队建制已经全乱了，不分官兵，就是一个劲地往张家口跑，渴得嗓子眼冒烟，终于看到一个水坑，都奔过去用手掬水喝，后面赶到的人挤上来喝，先到的人一边喝一边被挤得往水坑里面走。

这可跟我心目中的画面大不一样，按道理应该是热情的乡亲们沿路捧着白开水和煮鸡蛋，慰劳亲人解放军。

到了张家口市里，国民党军队撤得慌张，办公室屋顶的电风扇还在转，父亲他们就地睡觉凉快得很，然而半夜冻醒了，风扇还在吹，冷得没办法只能大家挤紧点睡。



后来又变成从张家口撤退，母亲有一匹枣红色马骑，是父亲的战友送给母亲，因为她怀孕挺着大肚子。然而没几天这匹马被父亲当成了工作马，拉车运载公用物资，而母亲换在牛车上颠簸行进，挎着一个小包袱，里面是边区政府发行的边币，连个烧饼都舍不得买，怀抱的纸币越走越贬值，最后只能买糠饼子，杂乱无章的（军旅时期的沈力先生）撤退中，衣食简陋，母亲极度贫血昏倒。我严格意义上

的大哥，就这样降生在途中民房，生下来很快就死了，我小时候问过父亲，你难过吗？父亲回答：哪能不难过，咧着大嘴才哭呢。我不太相信，因为他带着自嘲的笑，也因为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不缺男孩，这么说似乎不近人情，实际上他们那辈人，从战争中趟过来的，确实对孩子不够重视，甚至对生命的态度，与我们相比也有极大差别。母亲后来多病，她不是平日病恹恹，而是很精力充沛的，突然就得大病，年纪轻轻，大手术就动过两次。解放战争时期军队里的女性，大多这样，健康状况不佳，她们承受过太多的苦难，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

再后来是打石家庄，死人、鲜血，残垣断壁……

### 三

父亲一去无音信，我爷爷奶奶苦盼。北平解放，二老给报社交钱，要登寻儿启事。某日，一军人上门借扫帚，还扫帚时我爷爷跟他打听，说我儿子也是你们军队的，那军人问叫啥？一听沈力，说：“我认识，就在马路斜对面解放军画报社。我给你找去。”我爸这才知道，我爷爷一家子到了北京。

进北京城，仍然没安顿下来，随部队经常搬家，甚至来不及记地名住址，只说“司令部时，哪件哪件事”“那是在政治部怎么怎么样”以至现在我弄不清父亲到底在哪个部队，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都出生在陆军医院，即现在的隆福医院。朝鲜战争时父亲曾几次入朝，但不是战斗人员，没有参加惨烈的战斗。我从很小很小，对父亲就没有记忆，只记得住在金鱼胡同一个很深的四合院，里面热闹之极，似乎是部队家属的宿舍区。后院有座戏台，据说窦尔敦在这戏台看过戏。如今，窦尔敦的戏台下面炊事班养着猪，杀猪时猪拼命逃窜，炊事员追过来问我和二哥，看见猪往哪儿跑了？我和二哥手拉手来后院探险，二哥已经到了会答话的年龄，指了指，说“大狼跑到那边去了”。这个四合院紧邻东安市场的北端，几步跨过小马路就去东安市场买东西，是京城最繁华区，所以哥哥们记得，经常提起，而我，哪里记得，都是听他们说。我没有家的印象，全是军队托儿所（那时称为保育院）的记忆，我的每只袜子上都手绣着“小十二班沈真真”字样，不到三岁，全托寄宿，一星期回一次家，这种情形持续到六岁。直到1958年父亲转业地方，我才回家住。

为什么不愿意在军队干了，父亲没说。只知道军队内部搞肃反运动时，他不

同意整人，跟某个“坏透了”的同事起过矛盾。这对他是危险的，因为他不但出身地主，而且档案里还有我二爷爷进局子的记载。

#### 四

我二爷爷，就是上面提到的父亲的二叔，革命理想型青年。上世纪初，他到北京读书，因为向往共产主义，特意选择俄语专业，毕业后热衷于翻译苏联的政治经济类书籍。“七七事变”叔侄二人要去延安抗日革命，途经西安，二爷爷在陕西省政府寻到一个省长秘书的职位，停滞不前了。父亲便自己行动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经安排踏上了行程，中途被国民党宪兵队截获，父亲被押回西安。宪兵队通知我的二爷爷去领人。二爷爷到了宪兵队很生气，拍了桌子责问：我侄子什么也没干，你们有什么权力逮捕他？宪兵队的一位青年少校彬彬有礼，谦和地回答：他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如果真的干了什么，你能见到他吗？

二爷爷被噎住。

父亲仍然矢志不移，第二次偷跑成功，才到达延安。

侄子在眼皮底下丢了，二爷爷急了，毫无疑问是去了延安，他要找回侄子，方法很独特。

他在省政府的办公室里，有一位同事，两人办公桌对办公桌，久而久之二爷爷看出这位同事不同于常人，可能是共产党，他不点破，心知肚明而已，那时国共合作，两党关系表面上不算紧张。而这位办公桌对面的同事，也看出二爷爷已经心知肚明，也不点破，相安无事。二爷爷经常阅读侄子从八路军办事处拿回的新华日报之类的读物，再加上他以往的红色译作可能起了很大作用，稍加调查就可以判断他是进步人士，同事索性向他亮明身份，自己就是共产党。

二爷爷的独特方法是，向这位共产党讨要人，恳请他把侄子从延安退回来。共产党满口答应，却没有实际行动。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叔侄才重逢。这位共产党人是谁？二爷爷说，他名叫习仲勋。

日本投降后二爷爷回到北京，1945年至1946年期间曾经失业，他有一位郭同学公开身份是北平政府的秘书长之类的实权人物，二爷爷去拜访希望他帮助找个差事，递上自己“沈桂高”的名片，名片没起作用，根本没有见到这位郭同学。

解放后共产党在郭的办公室发现了沈桂高的名片，于是我二爷爷被抓进了北

京炮局子。郭同学真实身份是军统北平地区的负责人，跑到台湾去了。我二爷爷被关押了将近一年，审问时只是让老实交代，具体交代什么不明示。二爷爷搜索枯肠交代了一个够，唯独没提到曾试图拜访军统郭同学，他也是心虚怕招来麻烦，于是一直被关着。后来他的朋友辗转打听到惹祸的就是这张名片，1 想尽办法传话进去，告诉二爷爷关押的原因，这才赶紧交代，炮局子调查清楚了，不是特务，便释放了他。

不久，习仲勋到北京开会，造访西四二爷爷家。事先公安局通知：有客人要来。然后警卫人员在四合院里外转了一圈，习仲勋就进来了，聊天中，习仲勋听说二爷爷失业在家，便说，你跟我走吧，到我那里去。二爷爷拒绝了，半认真地说，此生不给共产党干事。习仲勋劝他不要怨气太重，看样子，二爷爷进炮局子的事，他知道得一清二楚。那是1950年，人们还敢随意说话。

虽然澄清了人也释放了，但是这件事对我父亲有重大影响，他有亲属在炮局子关押过，社会关系复杂，这在军队是大忌讳。1958年他在军队没有发展空间，于是转业便成首选。

二爷爷居家搞自己的俄文翻译，收益颇丰，后来政策不允许了，被安排到编译所，文革中经受煎熬，老伴成分是地主被遣返农村老家，儿子上山下乡去东北建设兵团，女儿是地质学院教师随着学院迁出北京，只剩他孤独度日，常来我家找我父亲聊聊散心，所幸他看到了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处境明显改善，1982年去世，享年70岁。去世前曾跟我父亲说，他这辈子冤。这都是后话了。

## 五

1958年，父亲转业地方，到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层干部，我也上小学了，对父亲仍然没有印象，很少见到他，每天从学校走很远去地球所食堂吃饭，偶尔能瞥见他跟一些领导在小灶房间吃饭，仅此而已，他下班回家，我早就在梦乡里了。父亲喜欢中科院这里的研究氛围，那时他们工作起来劲头十足，不分上下班。

有一次星期天休息不上学，我去同学家玩，进门吓一跳，她家客厅里有六七个人，都蹲在沙发上兴致勃勃聊着，其中有我爸，我还是能认出来的。他蹲在长沙发边沿上，旁边是这家主人，长沙发上共三个人一模一样的姿势蹲着，活像一

排麻雀立在电线上，高谈阔论，竟然是在开会，仍然是山沟里的习惯。那是卫一清家，地球物理所所长，也是老干部。

后来三年困难时期，才从食堂回归家庭，同舟共济。这段生活才使我明白父亲对子女深厚的爱，对他的儿子们不吝夸赞，喜欢画画的，夸他画得好，翻来覆去地看，真心欣赏，喜欢无线电的，也夸，哥哥自制出矿石收音机，父亲认真的用它收听，真心喜欢，对我和妹妹是宠爱，尤其对我。但是，规矩也大，立家规，跟长辈顶嘴绝对不允许，请父母帮助自己干这干那绝对不允许，这叫“哪有支使大人的！”父母有问的时候拖延回答绝对不允许，饭桌上的位置回家首先要做的事情等等等等，都有明确规定，稍有违规，他就怒目低沉着声音呵斥“没出息的！”情景吓人，都怕他。以至我从小就对“有出息”逆反。

## 六

1966年，一切都变了。



当时，父亲任大气物理所副所长，妥妥的“黑帮走资派”，声讨揭发检举批判，上台挨斗、“坐飞机”、挂牌子，一样不少。最大的罪名是配合所长卫一清将曾庆存、周秀冀、巢纪平三个业务尖子竖为红旗，给予荣誉。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三面假红旗！是白专道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沈力先生，1965） 如今这几个人都是院士。

一天中午，父亲拖着沉重的脚步推开家门，径直走进卧室，我们兄妹正在家等待父亲回来才能吃午饭，看到爸爸这样都不敢开口，面面相觑，妈妈出去到福利楼饭馆给爸爸买包子还没回来。一会儿，爸爸唤我送杯水给他，声音无力，我赶紧送进去，他躺在床上，起身接水，手颤抖不稳，他大口喝水时我惊惧地发现，他的后脖颈上有半圈割痕，血肉模糊，是挂牌子的铁丝勒破了肉，充当牌子的是一块沉重的黑板，挂在他脖子上弯腰90度挨斗。

在我心目中，父亲从来都是我们强有力的保护者，当他突然变成亟须别人关心的弱者时，我不知所措，用蚊子一样的小声嗫嚅“流血了，上点红药水吧？”父亲摇头，不说话。——如果胆敢抹药水，上班后一定会招致造反派的毒打。



妈妈买回来了包子，冲进卧室，爸爸站起来要去继续挨斗，妈妈劝他吃个包子，他不吃，有气无力地说：“不行，不能迟到。”我们面面相觑地看着父亲离开了家。妈妈大哭，喊了一声：“还让不让人活了！”马上又咽回哭声，将自己关在房里。

这只是开始。

一天，家里人正在吃晚饭，大气所的工人、造反派小齐来了，带着一众人马。一进来就让家人都站起来，对着墙上的伟人像，做晚汇报、唱语录歌。然后命令家人都站在那儿，不许动，大门也不许关。他们就开始在各房间乱翻，一个装礼服的紫色箱子，里面的东西被扔出来，空箱子被小齐用脚踩烂。翻出一张只有三十元的存折，他们以为是三千元，严厉追问别的存折在哪儿？我家靠工资生活，收支平衡，哪里可能有那么多的余钱。他们发现弟弟的抽屉上着锁，态度恶劣地要钥匙。气得弟弟事后在日记里骂他们，吓得母亲赶快把日记本烧毁。我的日记本被当场抄走，并且被仔细查看，其中几处还去问父亲是什么意思？记的都是鸡零狗碎的小事，一个十四岁女孩的日记里能有多大乾坤？此后，我再也不写日记。

后来，我注意到，小说都被抄走了，我看半截的赫尔岑的《家庭的戏剧》不见了。而满书架的《干部必读》没人动。抄家时父亲已经进了专政队，早就跟我们失去了联系，母亲、大哥那天恰好不在家，而我正在学校狂热地闹革命，也许正抄别人家呢！我确实纠集过几个女同学抄过一次家，回来后，母亲狠狠地训了我一顿。抄家时，我家只有三个孩子在，妹妹最小，才十岁。其实，真没什么可抄的，父母一心奉公，两袖清风。

接着，停发工资，只发家属生活费。

## 七

大气所的造反派驰名中科院，脱颖而出的两个造反派头头王锡鹏和戴连模建立的专政队（俗称的“牛棚”）也不同凡响。那里汇集了各色人等，中科院党委书记张劲夫，以及他以下的众位干部；学术权威、老科学家叶笃正、朱岗昆等，还有“黑线”培养的中青年科研骨干，如大气所的“假红旗”。

逼供、审问、写检查是专政队的日课。造反派审问叶笃正：“你为什么要从美国回来？从美国回来你不是特务是什么？！”

平时，“黑帮分子”必须劳动，我父亲负责打扫厕所，他是办事非常认真的人，将办公楼上下楼层几个厕所，马桶里外和洗手盆都刷得锃白锃亮，以至于官复原职后，他对大楼厕所卫生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远不若他擦得干净。

这些人经受各种折磨自不必说。唯一的好处，看管严，不能自杀。

苦难仍在进逼。

父亲病了，胃疼，且越来越严重，疼得黄豆大的汗珠滴落，专政队头头仍无意让他去医院看病，父亲低头坐着紧咬牙关强忍，手紧抓床板不动不嚷不哀求，大汗淋漓脸色惨白，同监舍的人们向专政队看守求情，说这样要出人命，送去医院吧，明显病情危急，看守才行动起来，让人用平板车送到北医三院急诊，是急性胃穿孔。

此时我母亲接到通知也赶到医院，大气所随着来的造反派告诉医院，病人是走资派，母亲眼见着医院听到是走资派态度就变得很恶劣，实在拿不定主意做手术，但是不能再拖了，只好冒险同意。父亲很快被推进手术室作胃切除。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不断地高声呵斥父亲，又低声安慰：“再晚来一会儿就只好办了”“饭都漏进肚子里了，很脏啊，给你彻底清理清理。”看来只给了半麻醉。手术非常成功。医生不敢露出同情心。扭曲的人性，畸形的年代！

当上班游街、下班挨斗，点名批判在机关大院里普及共享的时候，孩子们获得了一种新的平等。一次，我去西苑大院的同学家玩，她爸在家，见到女儿的同学来，不乏幽默地聊几句，就上班去了。过了一会，我们下楼，看见一队“牛鬼蛇神”正在游街示众，走在前面的正是同学她爸。同学羞红了脸，我倒觉得没啥。还有一次，动物所办了一个“黑线”展览，其中一个展台，摆放的全是蝴蝶标本。批判者说，这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辈子光研究蝴蝶。什么“白专道路”“脱离实际”“崇洋媚外”，帽子扣了一大堆。其实这位挨批的，是中国著名的科学家，蝴蝶专家，国内唯一。那些标本都很珍贵。可当时我也觉得挺可笑——蝴蝶有什么可研究的？一次，跟伙伴聊天时提起这事。不料，这个小伙伴红着脸告诉我：“那是我爸。”我无地自容。

那时，我在人大附中上初一，在学校里闹革命，很少回家，参加过一次“联动”召开的大会。可惜，台上讲话的慷慨激昂，我在台下却昏昏然，不明就里。联动顽固坚持血统论，玩死了自己。

妹妹上小学，学校停课。没有娱乐，她整天在大院里看热闹。一次，听说前楼一层有人上吊自杀，她们几个小孩趴窗户往里看，尸体朝着窗户，死人的舌头吐出老长，正对着她们。

那时，一楼居委会的革命夫妇，主动担负起监视我家的任务，对我妹妹、弟弟不是冷眼，就是呵斥，干涉颇多。几十年以后，我妹妹和弟弟一提起这两口子，仍旧恨恨，迎面撞见，也不理。

## 八

1969年初，我去内蒙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出发那天，刚从“牛棚”捡回一条命的父亲送我到中关村公交车站。一路无语，默默走到公交站，父亲才说了一句：“不要轻浮”。这四个字刻骨铭心，在兵团我谨言慎行，生怕给他惹麻烦，对异性更是冷若冰霜。我那时不懂，在那样形势下，一位父亲对远行的女儿能嘱咐什么呢？又敢说什么呢？

几年后我回北京暂住，此时父亲身体仍然不好，胃切除了三分之二，瘦削，又添哮喘和气管炎，断断续续休病假。他跟不上如火如荼的政治形势，唱不出成套成串的革命高调，老中青三结合，想让他复出，先试着



让他主持一个会议，一张口就出了岔子。他赶时髦（沈力先生在中科院大气所）引用了一句套话：“毛主席的一句话顶一千句”。砸锅了。人人皆知，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孤陋寡闻在“牛棚”里待得太久了，整整减掉了九千句。幸而饶过他，不堪大用回家养病去吧。

后来我们在家里笑谈他的这个口误，父亲理直气壮地说：“一千句就不错了，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哪有顶一万句的！”隐隐可以看出他对谁不满。

文革中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时候，曾经到处派人出差，调查许多当权派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帮助老干部们恢复了联系，本来他们已经多年不知道互相的下落，这下，兴起了一阵怀旧风，大家串门做客走动起来。父亲正是在这时候遇到老战友并请他打听苏家坨的往事。

那时，父亲的许多老战友经常来我家吃饭喝酒，父亲也常常出去找这家那家

的畅饮畅谈，身体和心情都好了很多。

有一次，我问他：“你怎么不找石少华呢？”

父亲一下子恼了，连声训我：“干嘛找他？干嘛找他！怎么想的？你！”

石少华那时是知名人士，江青的摄影老师。

我不敢问：您是不愿见石少华，还是不愿见江青的摄影老师？

父亲跟石少华是山沟里八路军时的战友，曾经一起在冀中军区画报社搞摄影，做宣传。后来父亲不愿意“成天到晚撅着屁股给别人照相”，说什么也不干了，离开了石少华的小组。

父亲不愿意成天给别人照相，常令我猜测。抗战时期物资极度匮乏，胶卷是珍贵之物，父亲他们不舍得给自己照相，每一张胶片都计算着，一卷36张，最后片尾还有半张粘在胶卷轴上，只有这半张舍得用在自己身上。所以我只见过两张父亲那个时期的照片，侧着脸，半张。那么，这么珍贵的胶片竟然要“成天到晚”给别人照，别人是哪些人？我见过家里保存的那个时期的底片，有大生产种地的、有拆毁炮楼的，没有见过一张首长的。

父亲对文革从不理解发展成不满，几年下来，全国混乱不堪经济下滑，物资供应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老战友们在一起牢骚满腹。他们本来疑惑是不是自己真的执行了“黑线”？现在一看，搞得远不如自己那时候！不由得怨气冲天。

知识分子同样不满，同样发牢骚。我父亲一向对年轻科研人员非常喜欢，他们是家里的常客，敲敲门就进来了，打个招呼就走了，不拘小节。谈论最多的是时政，消息灵通。邓小平复出，胡耀邦分管中科院，对政治挂帅，阶级斗争那套不予理睬，工作务实，令大家兴奋，新消息不断汇集到我家，父亲有兴趣上班了，并且在大气所的会议上真诚发言表示支持耀邦同志：我来上班就是一个表态——很危险的表态，对政治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诡谲局面丝毫没有提防。不久，邓小平失欢靠边站，胡耀邦败退出中科院，造反派扬眉吐气，父亲愤懑之下不去上班，这同样是明显的表态。

军代表来了，说，不上班按劳保处理。父亲让母亲拿出两个精致的盒子，打开，里面是他的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让军代表看。父亲一句话也没有。军代表走后，我问父亲，怎么不给他讲讲这些勋章的来历？父亲说，他要是连这个也看不懂，还有什么可说的。此后，上边再没有提劳保的事。

## 九

1976年9月伟人去世，父亲表现得非常淡漠，各单位设灵堂追悼时，他忙着救助一位哭得昏厥的老同志，搀扶送医热心不已，对志哀表忠心置之不理。我母亲为他担忧甚至跟他争吵，他固执不听。

致命之击来得很快。王洪文接管科技口的工作，他要杀一儆百威慑人心，拿几个老干部开刀。以整顿纪律为名，在二机部点了两个老干部的名，严厉处置。中科院要拿两个人祭刀，其中一个是父亲。形势紧张家里已经少有客人，大气所的巢纪平来通风报信：定下来了，对父亲的处置是开除公职，逐出北京。国庆节之后，将召开全院大会公布这个决定。多日来忧心忡忡的母亲被压垮，心理崩溃，开始埋怨，父亲一言不发穿上外衣走了。

我都看在眼里，心里害怕。天黑了，父亲还没回来。从他出门，我就担心他不打算活了。渐渐地怒火燃起，我暗暗发下毒誓：你们如果逼死我爸，我就要报仇，哪怕出卖色相也要爬上去，当官、复仇……。

深夜，终于等回了父亲。他去哪里了？从不提起。

国庆节假期后，父亲仍然不上班，等待，像屠场羔羊，引颈待戮。那天上午，大气所的一位科研人员王海文悄悄来到我家，与父亲进屋关门谈了很短时间，就匆匆回去上班。时间不长，妈妈满脸神秘的喜悦，忍不住要告诉我什么，示意我去卫生间关紧门后，她低声说出“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嘱我千万不要外传。刚才王海文就是来报信。说是大气所的高干子弟传出来的，王海文马不停蹄赶到我家，他也是担心我父亲扛不住，希望这个天大的喜讯能救他一命。很多年以后偶然看到陶斯亮的文章，写她的母亲也是躲在卫生间里告诉她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尽管我家极其普通，但是人同此心，何其相似。

父亲难掩兴奋，情绪变化过于强烈，竟然晕眩躺倒床上，我紧张地冲下楼跑到巢纪平家求救，巢纪平并不懂医，他握着我父亲的手连声喊：

“老沈，你不能出事，这时候你不能出事！”看来他也知道了。

四十多年了，我一直猜测，是哪个高干子弟将这个信息当作喜讯偷偷传播？他/她一定对文革有了清醒的认识。

## 十

“四人帮”倒台后，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写了《科学的春天》一文，洋溢着真挚的热情，近年来人们对他多有诟病，但这篇，肯定发自心底。

有人问过我，老革命，革命来革命去怎么革到科学院去了？问得好。那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一切使然。幸而，父亲这样的外行，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尽可能减少干扰，他能做的也只是这些了。老科学家叶笃正曾经对我哥哥说：“我这辈子遇到三个好人，所以没挨过整，第一个是张劲夫，第二个是卫一清，第三个是沈力。”

全国解放以后，父亲曾经想重拾夙愿接受高等教育，但是部队不批准。那时有调干制度：进城干部可以考大学降分数线录取，母亲抓住了这个机会，父亲则遗憾终生。他属于对知识分子少有偏见的那一类老干部。

老科学家赵九章文革中含冤自杀，父亲恢复工作后，为赵九章平反昭雪忙碌，下班回家后还要准备材料，带回家赵九章的档案，那旧档案袋塞得鼓胀，听他说这是次要的一袋。里面什么都有，各式人的小汇报，连赵九章的女儿大学时在宿



舍说的一句话，都有同学写来揭发检举的条子。亲戚的汇报也有，由此我那时才知道戴季陶是赵九章的舅舅。

老科学家顾震潮，非常绅士，总是随手拿着报纸，我亲眼看见他来我家做客，用报纸垫着触碰门把手，担心自己的肝炎传染，

（八十年代初沈力先生在做报告）他患的是一种凶险类型的肝病，不肯坐，站着说，完事就告辞。他1976年病逝，没能熬到打倒“四人帮”。其时正是“右倾翻案”，我父亲用积极上班来“表态”之时，接到顾震潮病危通知，他们几个领导赶到病房。回家后父亲心有戚戚，说，医生说只剩一两个小时了。顾夫人赶来，顾震潮才露出笑容，但一瞬间笑容变成苦笑，他什么都明白。大家退出，留夫妻在病房。一个小时后顾先生去世。

叶笃正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老科学家，父亲常与他交谈接受他的许多见解，改革大潮起步阶段，中关村依托中科院，涌现出许多计算机科技公司，中关村西边的马路，两旁小店铺鳞次栉比，欣欣向荣，叶笃正不以为然，告诉我父亲，那

些公司没有科技含量，基本都是二道贩子。四通公司声名鹊起，父亲嘲讽：“他们有什么拳头产品？拳头个屁！”他对做生意的科研人员相当鄙视。

对文革中的造反派，他主张打击报复，方法就是剥夺他们搞研究的资格，撵到公司去。他私下跟家里人讲，把他们全都赶走！结果，反而成全了这些人在第一波商品大潮中淘金。他们本来就不是钻研科学的料，放在另一领域反倒如鱼得水。所以，柳传志在数学所的一间简陋小屋创业起家的传奇经历，在我看来也许是数学所党委书记的歪打正着。各所的老干部互相熟识，观念接近。

在政治观念方面父亲对我们兄妹有很大影响，尤其在坚决否定文革这点上，我们都赞同。文革末期，同许多家庭一样，午夜我们全家常坐在一起聊，深深担忧国家的前途，迷茫无助甚至绝望。父亲比我们走得更远，他不仅厌恶“四人帮”，对伟人也不再盲从迷信，我发现他对周总理也持有很深的怨气，令我意外，他认为如果不是周的一再调和，文革早就搞不下去了。那时人们热爱周总理，所以他从不说出对周的不满，有一次我问他，你是不是不喜欢周总理，他点头，说了三个字：“不喜欢！”

## 十一

然而，1989年后，家里的和谐状态不复存在。

那晚，他彻夜不眠等待子女回家，对母亲说：“不对头，这不是鞭炮。”父爱深深，但难以抚平价值观上的深沟。饭桌上我们闲话琐事时，不小心流露出叛逆观点，他极敏感沉着脸不参与话题。有一次，甚至大怒，梗着脖子问：“共产党怎么你们了？共产党哪儿对不起你们！”顿时气氛降到冰点。

这是他的底线，他可以对曾经带领他们叱咤风云的领袖失去敬意，对党，却绝不容有半点非议。不可避免的，我们与父母之间，渐行渐远。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他曾经参观过焦庄户，那是距北京不远的村庄，保存着抗战时期挖有的地道，是热门的革命教育基地、模范村。参观回来，他心情沉重地说：“跟土改前差不多。”那么，革



命天翻地覆几十年，仍在原点，人民并没有得益，这能仅仅是几个伟大人物的错吗？他不肯挖掘，不想寻找真相。父亲这样的干部千千万万，勤勤恳恳，普普通通，只是不起眼的一块基石，一座丰碑的基石 还是一道高墙的基石，就不是他们自己能定论的了。

如果他能够活到现在，看见权贵与民众之间巨大的利益冲突，他一定后悔自己的狭隘，一定会实事求是地承认：一个政党，不可能永远正确。也许他肯于认真回溯，他所忠实于的党，从何时开始变化的？

【怀人】

## 钟沛璋之问

丁东



2021年2月6日，钟沛璋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6岁。

钟沛璋祖籍浙江镇海，1924年生于上海。15岁那年，他还是初中二年级学生，便由同学吴学谦介绍加入中共。后在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读书，领导学生运动。他办《青年知识》半月刊，办《学生报》，甚至办了公开的广播电台，开始了新闻出版生涯。

（钟沛璋先生，1924-2021）1949年，江山易手，他在上海主持创办《青年报》，当时25岁，可谓意气风发！他撰写热情洋溢的社论，被《人民日报》转载。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相中了他，1954年把他调到北京，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辣椒》《周末》等副刊接连在该报面世，成为最受欢迎的报纸。在内部讨论中，他响应项南青年团工作要群众化、民主化，团组织要独立开展活动的主张，却在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分子，夫妻二人双双落难。从34岁到54岁，中年遭遇蹉跎。1950年代末三年下放，文革中八年干校，艰苦的体力劳动，没有磨灭他的意志。下放五七干校期间，儿子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蒙冤，被关到零下40度的帐篷里反省，险些丧命。胡耀邦伸出援手，写信向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杨勇求助，救他儿子一命。干校归来，他见到胡耀邦，胡耀邦感慨：你的精神没有倒！



他终于迎来了拨乱反正，停刊12年的《中国青年报》复刊，他东山再起，重任副总编辑。锐气不减当年，和同事们把《中国青年报》推向了黄金时代。整版刊登《天安门诗抄》，连载《第二次握手》。报道陈爱武批评王磊，是他经手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

1980年，北京的餐馆数量有限，且大多为国营。位于珠市口附近的丰泽园就是京城当时数得上的高级饭庄。国家商业部是餐饮业的主管部门，商业部长王磊是这一行业的最高首长。他从1977年以来，到丰泽园吃“客饭”有据可查的达16次。其中1980年两次，菜价为124.92元，而他只付了19.52元。部长光顾，书记、经理往往亲自下厨，选派名厨师，精心制作，中华烟、茅台酒，各种最佳风味菜，尽管往上端。来丰泽园占便宜，不只王磊一人，某领导夫人光临，饭庄按实价收了几十元钱。不料，服务局某局长第二天就跑到饭庄来说：某夫人来了电话，告你们饭庄算错了钱。你们重新算算，把多算的钱退回去。局长亲自过问，饭庄领导只好将所收款的三分之二退给了这位夫人，并表示歉意。

当时的国人，对这种现象尚未麻木不仁。丰泽园饭庄的厨师长陈爱武是一个血性男儿。他本是工会系统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共青团系统表彰的新长征突击手。他找到饭庄党支部的几个委员商量怎么办，他们答复是：“这些事咱们没办法，管不了啊！”他又到北京市服务局上访，答复是：“这个事你知道，我也知道，知道就行了，不好办！”于是，他在1980年7月12日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封揭发信。中纪委收到信后，立即派出了调查组前来调查，确认揭发属实。中央领导人就此作了批示。10月14日，中纪委发出通报，批评商业部长王磊在饭店吃喝不照付费用，对陈爱武同不正之风进行斗争的精神予以赞扬。

《中国青年报》记者马北北当时25岁，她获知这一线索，向钟沛璋作了汇报，钟沛璋派她和一名老记者前往丰泽园采访各方人士，掌握了王磊在丰泽园饭庄吃客饭留下的记录和菜单。写出稿件后，送中纪委审核，得到“同意发表”的批示。于是，《中国青年报》在10月16日头版发表了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并配以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

当天上午，恰逢国务院例会。会前有人提到此事，万里说：我不知道啊，报纸为什么不跟国务院打个招呼？赵紫阳附和：是啊，报纸批评国务院的部长，应该跟国务院打个招呼。当晚，钟沛璋找到赵的助手鲍彤，开门见山，没有任何客

套话，只说了一句：事实是经过核实的。又问了一句：如果批评部长应该和国务院打招呼，是不是批评处长应该跟部长打招呼，批评厅长应该跟省长打招呼，批评老百姓应该跟居民委员会打招呼？报纸以后该怎么工作法？钟沛璋的希望，是把这个意见反映上去。

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和《中国青年报》同样内容和同样观点的头条，圆满地解决了问题。

面对舆论监督，王磊向中纪委作出检查，承认陈爱武的检举确有其事，“确实是特权思想作祟。除深刻检讨，坚决改正，并如数补足钱之外，请求给予党纪处分。”同时，写信给北京市第一服务局：“我确实多次到丰泽园饭庄吃过饭，今年以前的次数记不得了。今年有两次。为改正不正之风，已去信丰泽园饭庄，请他们查清我所有吃饭少付的价款，通知我，我当补足。同时，请你们协助我查清，我在各饭庄吃过饭少付的价款，通知我，我也补足。”10月19日，王磊把1979年和1980年在丰泽园的饭费如数退还。接着粮食部一位副部长也打电话给民族饭店说：“由于和饭店住得近常去吃饭，如果有收费不合理的地方，请你们查一下，马上把钱送去。”

这本是一件大得民心的事。然而，此后的年代里，主流媒体主动对在位高级干部指名道姓地批评，已成绝响。钟沛璋之问，在他的故土，至今没有答案。

除了办报，钟沛璋还兼任团中央研究室主任，倡议成立青少年研究所，请张黎群担任所长，自任副所长。就是这个研究所，使《走向未来丛书》的问世有了依托。

1982年，他出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倡导新闻五个转变，变单向流动为双向流动，既要上情下达，又要下情上达；变单功能为全功能，包括发布新闻、宣传思想，反映民意，传播知识，提供娱乐；变封闭为开放；变指令性为服务性；变灌输的方式为交流的方式。推动了新闻生态的改善。

他从中宣部新闻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到香港工作了一段，还主编过《民主与法制》，开办过展望出版社。他晚年最辉煌的一笔，是1993年受东方文化研究会之命，领衔创办《东方》杂志。本来，会长韩天石希望他办的是弘扬东方文化的学术刊物。他先后聘请李大同、朱正琳、梁晓燕担纲编务，把杂志办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关怀现实，立足够思想界前沿，开文化风气之先的重镇。

秦晖等一批中年学者在这个平台上亮相，成为公共领域亮点。钟沛璋主持《东方》虽然只有三年多时间，但这本杂志凝聚的作者群，影响力一直持续至今。

我们和钟沛璋相识是1996年。当时邢小群系列采访曾经被打成右派，在改革开放中再创辉煌的知识分子，钟老是她计划采访的对象。此前我和钟老没有见过面，但在《东方》发表过两篇文章。我们与钟老电话联系，他爽快地邀请我们到他家畅叙。一见面，他就说：“这次我到福建去，参观了邓拓纪念馆，看到了邓拓自杀前写的遗书，给他夫人丁一岚写的信，给北京市委的信，信的最后，高呼三个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的一生都在为探索一条光明的路而奋斗，但这条路走得很艰难。挨整的时间我们是完全正确的吗？不，挨整时我们有的思想也是很左的。他的开场白，一下子就打动了我们。后来小群写成文章《钟沛璋其人》，在方方主编的《今日名流》发表。

那次见面时，钟老对我说，你和谢泳合作的《文革中的民间思想概观》一文很好，可惜没有谈到王申酉。1996年是文革30年，《东方》策划了“文革三十年祭”专题，从不同角度组织了八篇反思文革的文章，我们这篇是其中之一。这个专题后来没有面世。这期杂志也成为《东方》停刊整顿的口实，钟老不得不辞去《东方》社长兼总编辑之职。

但钟老向我提出王申酉的问题，让我开始留意这个名字。不久邵燕祥先生介绍我认识了《人民日报》资深记者金凤。当年她曾经对王申酉事件进行过深入采访，手里保存着王申酉的珍贵遗作。我读了之后，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这样一位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驱，31岁就被夺去了生命，成为当代思想殉道者。由于王申酉的遗作没有出版，他的事迹也没有广泛宣传，所以国人对王申酉感到陌生。于是，我和金凤商量，重新编辑《王申酉文集》。这也是金凤多年未了的夙愿。当时，



我请钟老为此书写一篇序言。钟老很快写成。但书稿在国（晚年的钟沛璋先生）内联系了多家出版社，最后都功亏一篑。2002年，终于在王建国帮助下，由高文出版社付梓。出书后，钟老还介绍我拜访了力促王申酉平反的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施平先生。

与此同时，钟老自编一本文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世纪思索》，亦由高文出版社出版。内收《与江总书记一席谈》，记述了2000年12月3日，他在应邀前往中南海，当面向老同学江泽民建言，实现民主宪政，是改天换地的千秋大业。他请李锐老写了一序，同时邀我写一序。我以《钟老的心愿》为题，写成一序，表达对钟老的理解。

后来，我们与钟老还有一些交往。钟老为编书的事，和我通过电话。有些选题，他仍然想操作，无奈已力不从心。钟老夫人陈敏去世后，他搬到燕郊居住。离开了北京，和过去的朋友们交往就困难了。2015年，《炎黄春秋》举行新春茶话会，钟老赶来参加，我和他寒暄了几句。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告别龙年之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先生和《东方》前总编辑钟沛璋先生接踵辞世。回想1993年到1996年间，《读书》和《东方》可谓中国思想界的双璧。那种新见迭出激动人心的盛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每念及此，不亦悲乎？

## 【域外见闻】

### 我眼中的新加坡（5）

#### ——高薪养廉面面观

向真

多年来，新加坡被公认为全球最廉洁之地，然而据我了解新加坡并非天生如此，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都有哪些原因和佐证呢？请让我从开国总理李光耀说起吧。

#### 开国总理率先倡廉

李光耀1923年9月16日生，2015年3月23日故，祖籍广东梅州市大浦县党溪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新加坡首任总理，被誉为“新加坡国父”。

1959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一脚踢开时，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住在贫民窟，地狭人稠资源匮乏，乱象横生。那年新加坡自治政府初创时，35岁的李光耀拿着

一把大扫帚做道具，带领成立不到5年的人民行动党参加竞选，他说“我们病得不轻，贪婪、颓废盛行，为人民而战的人却在掠夺！”为此李光耀誓言扫除污秽，打造正直清明的政府，从而赢得了选举。

上任前，李光耀和家人约法三章：“我虽然当上了总理，但权力是人民给的，你们不要指望用我的职务谋取任何好处。”在1959年6月举行的就职仪式上，李光耀率领的人民行动党全部身穿白衬衫和白色长裤，用白色象征纯正和廉洁，以明心志。从此，只要代表人民行动党出席重要的公众场合，党员都会身穿白衬衫和白长裤，成为新加坡政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李光耀上任之初，提出公开透明的原则，确保国家每花的一分钱都必须记录在案，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官员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后患。

从2015年以来，我更多时间在新加坡生活，特别关注廉政话题，了解到该国各部门所有公务员每年7月都要进行财产申报，无法解释来源的一概会被查，缺乏合理答复的会被判为灰色所得。新加坡对此的惩处，不仅仅是罚款监禁，而是无法在新加坡立足，每遇贪污事件媒体会快速详尽报道，从此涉案人找不到工作，所有福利几乎丧失殆尽，在国人面前抬不起头。

## 国父不替好友求情

这里有个最著名的案例。

1986年，时任新加坡发展部长的郑章远被查出私受一笔贿款。郑章远是新加坡政界元老，人品出众，与李光耀私交甚厚，事发后立刻找李光耀认错并请帮他说句话，结果李光耀答复“我若帮你，新加坡就完了”。两周后，郑章远引咎服药自尽，留给李光耀一封遗书：“我深感沮丧，对于这样的事我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东方绅士，我觉得只有用最高的惩罚才能赎罪。”

据说这封悔罪信至今被保存在政府廉政公署大厅，以示警钟长鸣。其实按照当时新加坡的法律，郑章远最多只会被处10万元罚款与5年监禁，他因无法面对社会的唾弃选择自杀。两天后，李光耀给郑章远遗孀写信慰问，表达了自己的哀伤，同时表扬郑章远在担任部长时做出的功绩。不久后，郑家人离开了新加坡，再未回去。

上世纪60到80年代，先后有几位部长涉贪被查，他们的下场无一例外都很

凄惨，此后谁还敢涉雷区，难怪新加坡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成为世界著名的富有发达之地，也难怪李光耀去世后会有民众排队4、5个小时只为了见他“最后一面”，才会有几乎全岛居民冒雨出行，只为了送他“最后一程”。

## 官员高薪并非富贵

在北京时，多次听说高薪养廉的概念是改开后从新加坡引进的，但我在新加坡从没看到高薪养廉一说，后来查出这种说法并非无中生有，早在1992年，李光耀就对新华社记者说过“（新加坡）公务员的薪金都相当不错，因此公务员不必冒失去工作和养老金受贿的风险。”《人民网》上有过这一报道。新加坡公务员的薪酬的确很高，标准分15级（中国是26级），公务员最初月薪5000左右，做到议员2万左右，做到部长10万左右，做到总理年薪则高达220万。请注意这是新币，折合人民币需要再乘五。2020年有外媒对全球国家领导人薪酬排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名列榜首。

但是新加坡人知道，李显龙的薪酬只是名列国家领导人榜首，并不能名列新加坡收入的榜首，他的薪酬高低只有与本国收入对比才有意义。新加坡法律规定部长的工资是全国48个薪水最高的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和企业总裁的中位数的三分之二，其他级别的公务员工资也参照此标准制定。因私企高管工资高，所以公务员的工资也水涨船高；一旦企业不景气，私营企业职工薪水下降，公务员的工资也跟着往下调，如2008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新加坡各级别的公务员工资比上一年削减了不少。尽管新加坡公务员比其他国家工资高，但与本国私企相比，仍属于中等水平。

例如新加坡贸工部长颜金勇，他做部长的薪酬按说已经很高了，但比他以前做大众钢铁公司执行副总裁时低多了。不仅薪酬降低，他的一位朋友私下透漏“他现在虽然贵为部长，好像很有权势，其实远不及以前在公司做高管时那么一言九鼎。当上部长，他时刻都要笑脸相迎，讨好选民。”文化及青年部部长唐振辉也是，以前他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年收入在200万新币以上，当了部长减薪75%。内务部长尚木根也曾透露，他现在的收入仅为从政前的十分之一。陈庆炎做过新加坡第七任总统，他做总统的薪水虽然很高，但远不及他做华侨银行总经理时高。

李光耀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仅从工资收入的数字看，我可能是全世界政府领

袖中领取薪水最高的一个人，但从实际待遇看，我可能是全世界政府领袖中最穷的总理。新加坡公务人员的工资是全亚洲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甚至比亚洲人均收入最低的缅甸还低。”是的，新加坡官员没有任何灰色收入，不享受任何政府福利，他们的房子、车子都要自己掏腰包，政府一概不管。

## 高薪标准划在哪里

法律为什么要规定新加坡公务员的薪酬要低于市场中线呢？据说一方面因为只有确保公务员廉正清明，方能取信于民；另一方面公务员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职业，很多岗位的技术含量并不很高，社会的进步需要把最有能力的人从这个行业中挤出来，转移到更能发挥其特长的行业中去，如果用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薪金把人才留在公务员队伍中，将不利于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这就把握一个合理的度，官吏们俸禄太薄，难免鱼肉百姓，薪水需要保持在足以养廉耻而规避贪腐的水平。

我看到的现实是新加坡公务员的薪水，足以免除衣食之忧，满足敬老慈幼、交友结友的日常所需，足以让他们很体面的生活。比如我的朋友姚大姐，她是印尼排华最凶那年随父母逃难来到新加坡的，她有一子一女，儿子从英国名校毕业后回国进入公务员序列，原来月薪3万多，2018年时因在高等华语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每月增加薪酬1万元，姚大姐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开心极了。

新加坡官员的薪酬制度真正做到了裸薪制，除了正式薪酬之外，官员在职时不享有任何额外福利，卸任后没有退休金或其他待遇，与其他人一样领取统一标准的社会保障金。拿新加坡总理来说，房子、车子，哪怕差旅费都需要自己花钱，现任总理李显龙有晨跑的习惯，安全起见，他自己花钱请个保镖，不远不近跟在后面跑。总理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用说了。

## 监管需要落到实处

新加坡公务员收受礼品必须如实报告，政府每年发给每个公务员一个日记本，公务员必须如实每天记录公私活动，定期交监督部门审查，若有隐瞒，一经发现立即处罚。有个狱警接受了一名罪犯15元新币买的一包高档香烟，被判处监禁一年并退赔15新币，开除公职，永不录用，够严厉吧。与我们熟悉的那些

动辄贪污受贿几千万、上亿的官员比，新加坡公务员收入真不算高，欧美一些国家，虽然政府也算廉洁，但他们的总统退休后出一本回忆录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可能您想问：新加坡官员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呢？需要层次理论也许有用，在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友爱归属需要、尊重需要之上，还有自我实现的需要，新加坡公务员们追求的是更高尚的人生意义吗？新加坡选民说了，“以前他们争利于市，现在争名于朝，其实名也是利，说到底他们还是在为自己争利。”我听到这种议论，感觉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古往今来不乏舍生取义之士，他们不为青史留名，也不是为自己争名夺利，世上确实有人怀着宗教般的热诚和信徒般的献身精神，他们的人生境界远高于我们普通人。

当然新加坡公务员不可能人人都是活雷锋，正因为他们的收入比不上私企高管，所以每年都有一些公务员从政府部门辞职，跳槽下海，有人出去，也有人进来，有进有出，对于一支队伍而言，更具活力与生机。正因为新加坡的年轻人不像我国那么热衷于做公务员，所以如何以有限的待遇吸纳高级人才加入公务员队伍，成为新加坡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要说那还不容易？涨薪就是，可在新加坡，要给公务员涨薪还真不容易，公务员薪酬是有法律规定的，在法治完备的国家，没人敢僭越法规给公务员涨薪。

## 反贪倡廉举例

下面，我举几个实例，看看这个小国是怎么反贪倡廉的。

### 1. 职工总会主席潜逃后回国自首

1979年，执政党国会议员、全国职工总会主席（二把手）彭由国，被控四项共涉及8万新币的罪名，同时指他未经部长许可动用公款，为一家私人超市投资1万8千元。职工总会秘书长（一把手）蒂凡那出于对彭由国的信任，相信彭由国是无辜的，提议重新审查。由于李光耀看过调查文件，否定了蒂凡那的建议，批准了深入调查的报告。蒂凡那坚信彭由国无罪，约李光耀共进午餐，谈话时情绪激动，李光耀当他面打电话给贪污调查局局长，指示局长尽快安排在保密条件下让蒂凡那阅读此案相关证据，午饭后蒂凡那就看到真凭实据，什么都不说了。同年岁末，彭由国弃保潜逃，逃亡到泰国做工维生，穷困潦倒。2015年6月，彭由国到新加坡驻曼谷大使馆自首，次日由贪污调查局派员押送回新加坡。2016



年1月，时年81岁的彭由国认罪伏法，被判入狱60个月。

## 2. 轻罪也会丢饭碗

促成新加坡廉洁的不只是薪水，更有严苛的法律和刑法。新加坡在香港廉政公署之前就成立了贪污调查局，对官员的贪腐调查和处理一向毫不留情。1991年，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为了向单位多借点钱买私家车而伪造了假账单，还伪造文书谎称竞争激烈以骗取某外企投资一个度假村，虽然案发前他已经归还了买车借款，被忽悠的外企也没有轻信投资，但检方认定局长骗贷和欺诈罪名成立，判处他一万多新币罚款和一天蹲监。别看只有一天监禁，局长却因此丢了饭碗，丧失掉全部养老金，以前住在有私人泳池的别墅，这之后他和家人只能先租住出租屋，一切从头来。

## 3. 民防部队总监性索贿案

新加坡民防部队的职责是消防、拯救、紧急救护、人防等。2013年2月，民防部队原总监林新邦涉嫌索取性贿赂案开审，指控他在2010年在某停车场让彭姓女士为他提供性慰藉，之后帮彭女士向民防部队提供救援仪器，成为部队供应商。辩方称，林与彭有“真挚的友情”，难免“玩闹”，致使事发日有过一次身体接触。深入调查发现林总监与另外两女性也有染，结果罪名成立，2013年6月他被判入狱六个月，并被正式开除公职。

新加坡政府的廉洁与透明在全世界范围内久负盛名，对于贪污和受贿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对于廉洁的追求，是新加坡政府工作人员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绝大多数公务员能坚守这一原则。但是总有些人动歪心思钻空子，2020年9月媒体报道过一起32岁的警曹长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向两名女子索取性贿赂的案件，贪污调查局接到举报，当天就逮捕了嫌疑人，案情很快水落石出，警曹长依法被判入狱24个月。

## 4. 李显龙买房被调查

高薪只能养人不能养廉，高薪养廉不过是一种误解，高薪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世间许多人欲壑难填，即便高薪厚养，仍难免贪欲驱动，没有严格的管理和有效的监督制约，高薪避贪只是一厢情愿。新加坡官员的廉，并不依赖高薪，更来自透明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来自有效的舆论监督，来自独立而严苛的反腐机构。在新加坡，不怕媒体恶意中伤，政府会走法律途径起诉，而

不是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比如前些年传说李显龙买房享受了10%的折扣，一度遭到舆论质疑，李氏父子很快出现在国会公开质询现场，说明情况后由独立调查委员会立案调查，证实那笔折扣是商家的促销活动，对所有买家一视同仁，舆论迅速偃旗息鼓。

### 5. 2021年4月的一条新闻

2021年4月6日，新加坡两名前处长涉嫌贪污受贿被控上国家法院，案发时两人在国家公园局市政景观处任职，德瓦拉是高级处长，吴九财是处长。在国家公园局任职长达40年的德瓦拉面对两条控状，任职13年的吴九财面对一条控状，法庭指控两人在2018年接受周姓商人的贿赂，在澳门免费入住价值1263元人民币的酒店，周是一家建筑公司的总经理，以此促成与公园局的商业交易。

此外控方还指控德瓦拉在2018到2020年，接受过另一家公司的贿赂，享受过6次免费交通服务。在证据面前，德瓦拉和吴九财两人各自上交5000元新币被家人保释在外，开庭后贪污罪名一旦成立，将被依法判处高额罚款，或最长5年监禁，或两者兼施。2021年这条新闻，再一次震慑朝野。📰

### 【序跋】

## 痛彻拷问文革中的大学暴力

### ——《清华大学文革蒯大富的黑牢》序一

唐少杰

陈楚三先生嘱托我为他和胡鹏池先生、周宏余先生主编的《从生物馆到200号——清华文革蒯氏黑牢》（香港，时代文化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黑牢》）文集写一个读后感，我既为陈楚三先生在近于耄耋之年进行的辛勤编辑工作表示由衷钦佩，又为这一文集的主题而倍感沉重，因为这一文集是对“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初期发生在清华大学的一些暴力事件的追述和声讨！

—

《黑牢》文集主要记述了1967年年底至1968年春夏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即

“团派”所实施的三个暴力迫害案件。这三个案件分别为：

1. “蒋（南翔）刘（冰）反党集团及第二套班子”案。2. “罗（正启）、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反革命集团案”。3. “12人反党集团案”。这三个案件涉及原有的清华中基层干部和清华普通学生数十人之多。其实，这三个案件也可称为三种案件，因为每一案件里又有附属性的或亚一级的案件，可谓一案多发，案里有案；可称多案并举，案中套案。这里为了叙述方便，暂且称之为“三个案件”。这三个案件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是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

1990年代中期，我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查阅清华文革史料之际，阅读过大量关于清华文革初期暴力事件的资料（或材料）。《黑牢》文集中所提及的事件、情景、人物和案例等等，对我来说，不是呼之欲出，也是格外熟悉。至今，我都不会忘记当时我切身而又详细地对所接触到的这些档案资料给我带来的震撼、惊悸甚至无言的晕眩和无状的悲怆……无疑，清华大学档案馆的这些资料是迄今为止对于清华文革初期暴力事件最为原初（始于1970年，止于1980年代中期）和最为丰富的记载，它们包括清华文革初期所有比较大的而又持续性的暴力事件（包括武斗）的记述材料，涉及这些事件的由来、经过、结局、当事人、受害人、检举者、见证者、处理经过、结论等等多方面的文字材料，非常详实。这些材料主要是文革期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与文革结束后的“整党建党”等几个不同时期对同样的暴力事件（包括武斗）所做的审查或鉴定文本。这里，我不能不感谢清华大学在文革档案及资料保存方面所做出的出色工作。但是，非常遗憾而又十分无奈的是，这些档案资料被雪藏旷日之久，至今已逾五十多年，还不知何年、何月、何日能大白于天下？我坚信，一旦公布或公开这些档案资料，一定会确凿而又有力地证实《黑牢》文集的诸多方面。

《黑牢》文集对于上述“三个案件”的大致由来和主要过程做了比较细致的揭露和展现。下面，根据我所作的档案查阅情况，补充一下这“三个案件”的具体背景：

一是清华文革初期的一大症结实质上是干部问题。1966年6月文革爆发不久，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为核心的“工作组”进驻清华，接管了清华各级领导职权，使清华大学原有的上到校级干部下到基层干部从整体上“靠边站”，实际上

被罢免。这也如同林彪后来在1966年12月中央工交会议上讲话中强调过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批判干部的运动，就是对干部“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随着文革的进行和深入，如何对待或如何“处理”上述干部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因为，除了数十位原校级干部以及原校党委委员被打成“黑帮”外，当时谁都无法确定约计四百余位的清华中基层干部究竟是文革的对象、文革的敌人还是相反。一时间，清华中基层干部仿佛成为遭致文革遗弃的“政治孤儿”。

二是清华文革初期群众运动的分化和分裂。1966年9月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尽管在12月下旬与先前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但是二者的分歧日益加剧，围绕着一系列的具体问题而展开的论争很快就凸显在干部问题上。1967年4月14日，“四一四串联会”（即关于干部问题的串联会）的成立，揭开了清华文革群众两派分裂的序幕。5月29日正式成立的“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正式标志着团派与四一四派的决裂。尽管有9月至11月短暂的联合，两派的对峙和冲突已势不可挡。到了11月下旬至12月，暴力斗争甚至小规模武斗已初步提到了清华文革的议事日程。

三是清华文革初期干部问题的激化。到了1967年3月，即使原清华校级干部成为文革初期政治上的“死老虎”，但是数百位清华中基层干部的文革政治“归属”依然显得格外瞩目、迫切和沉重。“无产阶级司令部”（特指以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最高领导机构）为了加重打击刘少奇的文革路线和更加广泛、深入地推动文革，以清华干部问题为切入点，通过《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特别是关于清华干部问题的调查报告，原本是有意在文革大局的干部政策上稍加调整，但却无意引爆了清华文革干部问题这一“政治炸弹”。

四是清华大学1967年5月“革命委员会”的夭折。在我看到的清华文革档案材料，上述“三个案件”发生的一个重要源头在于1967年5月30日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流产。“革命委员会”这种在文革初期各个单位、部门或地区的临时权力领导机构能否在清华大学最终问世，关系到团派的地位、职权、命运和前途。因为，按照“无产阶级司令部”1967年初的要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原则是所谓“三结合”原则，即由革命群众代表、解放军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各占三分之一的人数构成。第一种代表比较好确定，尽管团派和四一四派在1967年4月至5月在两派代表人数的分配比例有过交集或争执，

但是这个问题到了秋季已不是主要问题。第二种代表很容易认可，因为解放军代表来自清华大学之外。关键在于第三种代表。这种干部代表的选出或确定对于两派来说事关重大，两派都不遗余力地推举各自所认可的干部代表。到了1967年春夏之际，团派没有赢得清华原有的广大中基层干部的信任或支持，而四一四派却在这些干部中赢得了多数，至少是赢得了广泛的同情或响应。1967年10月之后，团派以多种方式猜测或从多种渠道得知四一四派准备“启用”该派的干部代表。12月下旬，四一四派在一份例行的给“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情况简报》中，建议未来成立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里应该有10位左右这样的干部代表，明确指出由“革命小将”担任这一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是不适宜的。这就是说，蒯大富或者任何其他一位团派代表以及四一四派代表都不能出任清华革命委员会第一把手，而应该由四一四派所推举的清华中基层干部代表来担任。这无疑扼杀了团派梦寐以求的“革命委员会”的生机。值此之际，团派与四一四派的矛盾和斗争已不可化解，攸关各自存亡。团派为了全盘打击并且最终消灭四一四派，开始酝酿、发起和实施对四一四派的一系列暴力攻势。

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团派主要从两条“战线”入手：一是以所谓捏造“林彪语录”为四一四派战歌的“罪名”，“整治”陈楚三。打压陈楚三，也就是“稳、准、狠”地打击四一四派，因为陈楚三本人就是该派的领导人之一以及作为该派中坚的原“东方红总队”核心代表。二是不遗余力地打击以罗征启、吕应中等为代表的、已完全倾向或投入到四一四派的清华干部，因为罗征启差不多是大张旗鼓地批评、指责团派干部的政策。这种批评、指责在当时的清华园里，反响非同小可，意义非同一般；而吕应中，据清华文革档案的记载，团派猜测或推断有可能出任四一四派所推举的革命委员会的干部主要代表或主要负责人，这不啻粉碎了团派要占据革命委员会头把交椅的念头。事后来看，团派在这两条战线进行的既有同时又有交叉的攻势（还包括“12人反党集团案”中对四一四派一些普通群众的迫害），既要削弱四一四派的中坚力量，又要震慑已站队到四一四派一边的清华干部，更有可能动摇甚至瓦解四一四派与这些干部的“政治同盟”。颇有意味的是，团派在这两条战线的攻势都主动地、直接地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望和权威联系起来。不言而喻，把陈楚三的问题与林彪“副统帅”联系起来，把罗征启等几位干部私下的时政议论（实际上是其中的一位干部顶不住团派的残

酷虐待而“供出”了同伙），经过团派的“加工”和“衍化”后当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们”的“罪证”，因此，团派仿佛坐实了四一四派和上述干部的“罪过”的理由，力求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在清华园里展开大规模暴力斗争的首肯或认可。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团派旨在消除四一四派和原有清华干部势力而大肆实施的暴行鸣锣开道，大造声势。

## 二

通过《黑牢》文集，结合清华文革初期的历史，不难看出，暴力的威胁、暴力的恐怖、暴力的加剧直至暴力的泛滥恰恰是文革得以大行其道的政治“空气、水分和土壤”。如果说文革的一大本性就是暴力的话，那么清华文革更是这种暴力的一种典型。甚至可以说，没有群众组织的暴力，清华文革就不会与文革前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区别开来。

我曾期望，对于文革历史的研究，应该建立或开辟诸多相关的文革研究专题，如同建立“文革档案学”或“文革文献学”那样，很有必要建立“文革专案学”以及“文革暴力研究”等专题。无疑，《黑牢》文集的问世为建立这样的研究专题，提供了饱含灵与肉、浸透血与泪、闪烁剑与火的素材。

毫无疑问，文革的暴力渊源于文革前的革命暴力的历史传统，延续了文革前那种“暴力作为革命的最高斗争形式”的政治惯性。唯有如此，文革才有可能成为横扫天下或几乎无敌于天下的“大革命”！然而，文革的暴力不同于以往革命暴力的特性和取向主要在于：在中共一元化领导陷于文革初期的无序（所谓“党天下”与“毛天下”之间张力的结果）之后，集聚地由文革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实施或体现出来。曾几何时，文革的群众暴力甚至比起文革前由中共党领导的国家所进行的暴力职能更加具有单位性、日常性和广泛性的特色。这主要是因为文革初期在全国、全社会范围所鼓动、所倡导的“砸烂公、检、法”，直接造成了由文革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实施“公、检、法”职能或准职能的后果。在原有的国家暴力机构——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的情况下，文革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一时间就可在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单位成立变相的暴力机构，诸如专案组或专政队等等，就可巧立名目地或者干脆唯己所需地来设立林林总总的“专案”，就可建立变相的监狱或牢笼，从事变相的专政镇

压（即“群众专政”），最大限度地加以对人们生存领域的每一角落进行日常生活专政！“砸烂公、检、法”就直接等同于文革初期暴力的无法无天。仅就这一点而言，不能不说是文革暴力的一大“特色”！

通过对团派的暴力行径的谴责和控诉，《黑牢》文集几乎是无以复加地展示出了文革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实施暴力的绝对残酷和极端血腥。这部文集不只是有理有据地展示出团派暴力者们的偏激、蒙昧、凶狠和疯狂，而且无可辩驳地揭露出团派暴力者们曾实行的多达数十种的、惨无人道而令人发指的暴力手法或手段。这部文集的主编者以及相关作者对于团派暴力者们及其暴力行径所发出的有无人性以及人性何求之类问题的诘难和痛斥，恰恰确证了这些暴力者及其暴力行径的非人性、反人性！的确，文革暴力的一个政治“常数”就在于：唯有致使暴力无所不用其极，才有可能达到暴力者们最为切实的效益和最为功利的目标。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清华文革初期暴力必然与有形的残害血肉相连，为什么暴力一定与无形的恐怖形影相随，特别是在团派那里以及在它那二十个月的短命的历史中，为什么暴力与专制孪生共存。

据清华大学档案馆的档案记载，团派一些暴力积极分子，为了借鉴历史上有关暴力行径的手法或经验，特别热心于从清华大学图书馆借阅、查找关于法西斯组织特别是纳粹党人以及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暴力措施的书籍，力求找到用于整治、迫害四一四派的有效手段。可见，历史的暴力与暴力的历史总是气息相通的。

《黑牢》文集基于清华文革初期上述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一方面，展现出了文革暴力问题的诸多特性和取向，为后人研究和剖析文革暴力问题提供了既独特又沉重的个案素材。另一方面，直接地或间接地把文革初期的暴力问题与武斗问题联系起来，呈现给读者。显然，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革的暴力必然趋向武斗，而武斗则是更大规模和更为独特的暴力。但是，在我看来，文革暴力还不能直接等同于武斗，这种暴力的“重心”是针对个人或个体的，即对于文革对象或文革受害者的身心迫害。武斗作为文革所独有的现象甚至作为文革所专有的名词，比暴力更为深刻、复杂，这种武斗的“重心”是指向群体或集体的，即指向与武斗者一伙相冲突或相厮杀的敌对者们。然而，这并不是说暴力比起武斗来要轻松、减缓、简单或个别。实际上，文革暴力持续的积累和经久的进行一定会导致把暴力的矛头由施虐于文革的对象或敌人转向加害于文革中与

已分歧或分裂的原“同类”。换言之，文革武斗大都是交互性的，而文革暴力大都是单向性的，即这种暴力是受害者无法逃脱、无法抗拒的。不管怎样，《黑牢》文集从诸多角度非常有力、具体地表明了由文革暴力导致文革武斗的必然性！

这一必然性在于：除了前述的团派在清华文革现实的最大利益和目标是从政治上消除四一四派和原有清华干部势力，还深深地置于文革及其群众运动的政治逻辑之中。概言之，暴力就是文革群众运动的一大“天性”，就是文革群众组织的某种“缘分”。如同历史上诸多极权政治下的群众运动的演变规律一样，整个文革及其群众运动也一定是循着“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没有敌情也要制造出敌情”的政治取向而衍生、嬗变，或如文革后期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兼“工宣队”的一个头目所概括的：“有了群众，就有了敌情；有了群众，就有了法宝；有了群众，就无往而不胜”。这里要加以历史补充的是：不是无往而不胜，而是最终一败涂地，或是对我在前些年曾提出过的问题稍加转化：对于文革的暴力以及暴力者们而言，有无成功者？谁是胜利者？

文革暴力的运行和演变也意味着某种历史的“悖论”。因为，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上乃至在世界历史上，由社会或国家的某一个非强权暴力性的单位、部门、机构在各自的小天地里来大加实施执法、司法和立法的职能或准职能，具体地说，在这类单位、部门和机构中可以任意抓捕、随意拘留、私自刑讯、设立牢狱、行刑惩罚、无限期拘押直至没有限度的、名为“逼、供、信”而实为无限恶化的生存摧残和生命折磨……这些都必然地从道义上带来文革群众运动的失败和衰亡，从人性上标志着文革群众组织暴力活动及其措施的短命和罪恶，从人道上注定了文革所有暴力施害者终生无法摆脱的心灵污垢和难以洗刷的生活罪过！

《黑牢》文集清晰而确切地证明了文革暴力的这种悖论。显然，文革暴力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惨无人道地施虐于受害者的同时，也仿佛天然地断丧施害者本人。如同历史上许多战争的发动者常常无法决定战争的命运和结局那样，暴力发动者和实施者每每无法左右暴力的走势和归宿。这一点，除了体现在文革暴力必然导致文革武斗的结局外，更沉重而又更多样地体现在几乎所有这些暴力和这些武斗的发动者、实施者（更不用说指挥者了）彻底失败的宿命。换言之，文革暴力的异化与自我异化称得上臆足相抵，无不决绝。

《黑牢》文集还有一个值得瞩目的特点，即它不但详细地记述了清华文革一



些受害者的苦难经历,而且很难得地列举出了施害者的名字及其令人发指的迫害行径。这是文革研究尤其是文革个案史研究的一个进步。《黑牢》文集仅就这一点,就不同于许多关于文革的回忆或评述回避那些所谓“小人物”般的迫害者的名字及其罪过的做法,而是很有可能把这些类同汉娜·阿伦特当年所指称的体现着“平庸之恶”的文革基层作恶者切切实实地列入了文革的耻辱簿上。这种难能可贵的列举大有可能起到了警示后人的独到作用。

因而,对于《黑牢》文集的读者们来说,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就那些文革暴力的策划者、实施者、推动者而言,暴力,尤其是他们身体力行的暴力,最终给他们本人留下了什么呢?历史已经证明并且不断证明,这一定不是什么遗忘,不是什么淡漠,也不会是暴力阴影伴随的岁月静好,更不是在天地良心责问下的无愧、无咎、无恶、无罪。

### 三

在清华大学即将迎来建校110周年之际,《黑牢》文集在促进回顾和反思清华文革历史的同时,对于人们今天和未来更好地建设清华大学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通读《黑牢》文集,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提出下列的问题:清华文革时期的种种暴力由何而来?何以可能?何者所为?何以必然?等等。显而易见,这种种暴力直至这些暴力的肆虐和泛化,既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遥不可及的,它们与文革之前所流行的暴力话语、暴力心理、暴力传统和暴力时尚等等息息相关。显然,从文革前的“批判的武器”到文革的“武器的批判”近在咫尺,接踵而至。无须讳言,包括暴力问题在内的清华文革的众多问题都与清华文革前的近十年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毋庸置疑,清华大学自1950年代末期开始的大规模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教育革命”乃至一些列政治运动,为整个清华文革“锻造”出了对于暴力的手段、策略和方法驾轻就熟甚至信手拈来的激进学生或激进群众。从《黑牢》文集中所揭露的那种热衷于暴力的激进学生们的种种残酷暴行,无可辩驳地印证了文革之前清华大学多年的一些政治运动及所谓“政治教育”的失败,而这种失败直接或间接地是由文革之前的更大范围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生态所促成的,并且这种失败的最大结果在文革时期直接夯在了清华昔日的校长、干部和教师的身心上。因此,无法否定的是,清华文革暴力

的必然性不仅仅体现在那些实施暴力和崇尚暴力的少数激进学生身上，而且直接渊源于1950年代末期至1966年上半年清华大学的历史。借用已故的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那掷地有声的说法：“从反面讲，没有蒋南翔时期（当然不能由他负全责）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批判会，也就没有迟群时期的在‘知识愈多愈反动’思想指导下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惩治和迫害。”（徐百柯：《民国那些人》，第9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这里，我要补充一点的是，从清华的蒋南翔时期走向清华的迟群时期必然有一个“过渡期”，这个为期不到两年的“过渡期”名曰“蒯大富时期”。

在迎来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之际，结合《黑牢》文集所提及的文革初期不堪回首的暴力问题，人们不禁要作出亘古常新的发问和探寻：大学，应该以何为本？大学，应该以何为职责、功能、取向、价值、操守、目标？我个人进一步发问和探寻的是：大学与暴力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当大学成为暴力遍地的角斗场，暴力猖獗的集中营时，这样的大学是否还称得上所谓大学？

清华大学新一代的教师、学生无法想象当年清华文革暴力的残酷和血腥，无法相信少数清华学生在那时竟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暴力行径。其实，面对过去，展望明天，经过反思，拒绝遗忘，人们不难发现自己今天的生活与文革暴力问题相距并不异常遥远，甚至并不完全隔阂。《黑牢》文集给文革之后的清华大学以及清华人敲响了一座警钟：现今的和未来的清华大学能否避免、拒斥、消除或抵抗任何形式的暴力？

据报道，清华大学已于2020年夏秋之际终于“全面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消息传来，评说不一。无论怎样，清华建校不到110年，就“全面建设”成了“世界一流大学”，并在中国的两千多所高等学校中独拔头筹，实在可惊可叹，可敬可佩！在清华校庆110周年之前或之际，纪念或回顾清华历史的书籍接近百部、文章难以计数，但令人遗憾的是，真正探讨清华历史上的曲折、坎坷、苦难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经验教训的著述，真乃凤毛麟角。正是如此，《黑牢》文集在2021年的问世，堪称划过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之年上空的一颗“亮星”！

阅读《黑牢》文集，在我看来，还应结合通读陈楚三先生的回忆录《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香港，明镜出版社，2017）来进行。我认为，这部回忆录是数十年来众多清华校友各自写出的回忆著述中，最具有价

值、最具有个性也最具有可读性的一部回忆录！这不仅仅是这部回忆录在记述清华文革诸多问题方面与这部文集交相映证，而且这部回忆录的一大亮点在于：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先生的哲嗣，作为清华大学文革历史的一位参与者、见证者和评判者，陈楚三先生独具匠心而又游刃有余地把文革前一文革时一文革后的个人特殊经历和深刻反思加以融会贯通，使之高屋建瓴地映现出的国史一党史一校史一个人史之间有机互动而力透纸背的“脉络”，切实为人们理解和把握《黑牢》文集创建了一处“大历史观”的“制高点”。

【序跋】

## 感言四则

——陈楚三著《清华文革蒯氏黑牢》序二

孙怒涛

楚三兄邀请我写一篇感言。正好，我也有几句话想说。于是，借此机会说点我的所思所想。

一

在文革中，蒯大富是有罪还是无罪？

社会上至今还有一些人认为蒯大富并没有犯什么罪。他在文革中响应毛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只是犯了严重错误。而这对一个青年学生来说是很难避免的。

蒯大富本人在法庭上也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

我认为蒯大富既是无罪的，也是有罪的。

说他无罪，是指公诉人指控他“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这些都是不成立的。蒯大富对强加于他的政治罪的抗辩和自辩是非常有理有力的，我很赞同。我甚至认为，文革期间，任何一个学生领袖或文革头头，站在哪个司令部，执行哪条路线，保过谁反过谁，充其量都不过是认识上的差异问题。罪与非罪的分界线在于是否危害了人的生命权，侵犯了人的尊严；所有严重践踏人权、丧尽天良的暴行都是犯罪行为。

蒯大富是有罪的，他在三件大事中负有刑事责任：

1. 蒯大富成立专案组迫害干部和同学，造成多起致死致残的严重后果。
2. 蒯大富挑起百日武斗，造成数十名同学和员工致死致残的严重后果。
3. 蒯大富在 7.27 工宣队进校时武力抵抗，造成数百名工人军人致死致残的严重后果。

在这三大事件中，蒯大富都负有最主要的、直接的、领导的责任。也就是说，蒯大富在这些问题上都突破了做人的底线，犯有反人性的罪行。以当时的“公安六条”为自己狡辩是无理的，徒劳的。

本书所记录的史实就是蒯大富犯有刑事罪责最强有力的佐证，将在罄竹难书的文革罪恶簿上增添沉重血泪的一笔。揭露、记录蒯氏黑牢的目的，就是为了将罪恶的文革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书名《清华文革蒯氏黑牢》也很贴切。

## 二

清华文革的亲历者们常常在探寻的一个问题是：两派争斗的实质是什么？

有人认为既然两派都错了，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吗？

政治上，路线上，两派都错了。这样的认识，虽然是很重要的，但相对而言还只是浅层次的。进一步深究争斗的实质，有助于我们对文革本质的揭示和反思。

大约十几年前，曾有好友提出，团四之争是人性之争。

这一观点给我的启发如醍醐灌顶。

但若认为恶人大都在老团，虽从现象上看似乎也成立，但总觉得以派别划分善恶很片面，很不妥。

后来有一种说法是，两派斗争是 414 群体与团派中的极端分子在人性上的斗争。这种说法虽然正确指出了反人性的极端分子仅是老团中的极少一部分，但仍未跳出以派划线的思维局限。

我现在认为，清华两派争斗的实质是，以蒯大富为首的极少数极端分子的反人性恶行，与全校师生从强烈不满到顽强抗争的一场斗争。

这“强烈不满”在广大团派群众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而“顽强抗争”在四派群众中则是一贯的、持久的。

我认为这样的表述，既客观、正确地反映了清华两派斗争的历史真实，也揭示了斗争的内在实质。

### 三

施暴者在以后的清查 516、清理“三种人”等运动中受到整肃，受到“记录在案”的处置。尽管这些运动本身及其手段是相当粗暴的，也是不人道的，造成的后果有的是很严重的。但是，与他们的罪错相当的那部分惩戒，也算是应得的。

这些当年的施暴者，现已垂垂老矣。他们自己，或同情他们的人，希望他们有一个安宁的晚年，不再受到“第二次伤害”。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有合理的成分。

但是，还有许多被这些施暴者加害的受害者，他们的冤屈始终没有得到伸张。他们当前的诉求并不是再追责施暴者，甚至也不希冀这些人的道歉。他们仅仅想知道事件的真相：是谁，又是为什么要抓他们，关他们，毒打他们，以解开几十年来萦绕于心的困顿，抚平久久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与避免对曾经的施暴者的“二次伤害”相比较，他们的“原发性创伤”是不是更值得同情和治疗？他们最后的一点微薄愿望是不是更应该得到满足？

### 四

打人、抓人、关人、武斗场上打死人，这样的恶行，团派有，四派也有。对所有这些恶行，不管是哪派干的，不管责任人是谁，都应该表示义愤，予以谴责；对受害人，都应该深切同情，给予声援；加害者都应该真诚道歉，深刻忏悔。

客观地说，反人性的恶行，发生在团派中，数量更多，性质更恶劣，后果也更严重，而且是有组织的行为。这不会因为个别老团在科学馆里被打而改变。

清华的两派开始了和解，这些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离真正的和解还差得很远。什么是真正的和解呢？那就是在揭露真相的基础上求得宽恕，有了基本共识，从而达成的和解。

从国家的和顶层的层面而言，重要的文革档案大多没有公开，重大事件的真相没有完全揭露，文革并未彻底批判，反思远未完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个基层单位的群众要做到“真相——宽恕——和解”是极其困难的。

即便如此，我们总不能消极等待，还得努力去做，承担起我们这代人最后的历史责任。就清华而言，如何揭开那些还被掩盖着的重大真相？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敢于“自曝家丑”，对本派犯过的不人道、反人性的恶行，不回避，不护短；对于勇于揭露、批判的同派校友，应给予鼓励和赞扬。

本书在这方面迈出了勇敢的可喜的第一步，值得肯定。作为 414 的第二把手，我对本派给团派干部、群众有过的不人道行为深感羞愧，向受害人表示真切歉意。我吁请曾经犯过错误的本派人士，能在适当的场合公开地、直接地、真诚地道歉。当我们离开人世之时，做到“质本洁来还质去”。年轻时犯了这样的错误多少可以谅解，要是至今仍不醒悟，无认识，蒙尘的良心是无法面对历史，面对子孙的。

文革阴影尚未消褪，历史殷鉴需要警醒。在当下及未来的社会大变革中，面对与常识背离、与人性冲突的威压或者诱惑时，如何以良知守护做人的底线？

亲爱的读者们将会从本书的阅读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述往】

## 我对北京 25 中文革初期的回忆

白音桦

首先，我想说，对不起，彭老师，对不起，初三四班的同学们。

彭高致老师是我们北京 25 中 66 届初三四班班主任和语文老师。

多年来，我思想上一直有一个沉重包袱，许多往事尘封在心底。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保持了沉默。但是沉默并不代表遗忘。因为我在文革初期，带着全班同学批斗过彭老师，这是我一生都不能原谅自己的污点。这些年来，我是逐步进行反思的。特别是在经历了下乡插队，经历过社会底层的酸甜苦辣，我才深刻认识了自己的问题。我那时年轻无知，伤害过多人。回想起我在文革初期的那些表现，只觉得自己是一个小丑。心底里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我觉得，道一万次歉也无法消除我深深地愧疚。

1966 年 6 月文革开始，北京 25 中开始停课闹革命。全校贴满了大字报。开始是批判三家村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后来是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我们这些初中生其实什么都不懂。既然毛主席要批判和打倒这些走资派，那他们肯定就是坏人。我们开始没日没夜地抄写大字报。我的毛笔字书法也飞速进步。

我们学校的高中学生闹得很厉害，写了很多不同观点的大字报。

8月，我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当时我的父母还没有被打倒。我被选为年级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学校初中联络人。

学校里开始实行夺权，把校领导都打倒了。先是把校长及教务主任等关进了学校后院教室，进行批判斗争。然后是出身不好的老师也被批斗。学校成立了文革委员会，革委会主任是高中学生白克刚。滕耕耕是红卫兵总负责人。学校里开了很多次批斗会。搞批斗会的主要是高中学生，逼迫校领导和老师交待“罪行”。他们给校长挂上大牌子，迫使他低头弯腰，向后反举双臂做“喷气式飞机”翅膀状。还对其拳打脚踢。对被关押的老师也进行了批斗殴打。25中语文老师王守亮的妻子杨淑辰是苏联驻华大使馆的雇员，他们搜集了当时在街上公开出售的各种红卫兵小报，提供给苏联大使馆。结果夫妻双双被以“叛国罪”执行枪决。

因为彭高致老师是前国民党将军的子弟，校革委会指示，要我们在班里开批判斗争会。我心里其实有些挣扎：彭老师对我一直很好，我非常喜欢他的课。多次受到彭老师的表扬。如果哪次作业完成的好，彭老师就会用漂亮的行书毛笔字写一首诗赠给我们。记得写给我的有杜牧的“山行”，杜甫的绝句等。彭老师还很注意对我们的品行培养。多次带我们参加义务劳动，特别是跟东城的环卫工人一起掏粪。这让我实在不能接受他是坏人的说法。难道父母坏，子女就不好？我一直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我对学习好的同学一直佩服，而对出身好学习差的同学却有点不以为然。可是，我必须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我自己不想出面，就让班里的文革核心组副组长潘声滨来组织批斗会。

潘声滨和我们一样，从小受盲从迷信教育及阶级斗争和仇恨教育，可能是因出自军人家庭，在性情中似乎有尚武的青春暴力倾向。他积极组织了批斗会。我讲了学校革委会的要求后，宣布批斗会开始。潘声滨让两个同学把彭老师押到了教室讲台前。我带头喊起了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分子彭高致！同学们也跟着喊了起来。两个同学抓住彭老师的胳膊，按照当时的流行方式，给被斗争的人剃阴阳头，肆意践踏人的尊严。潘声滨就按着彭老师的头，用理发推子从脑袋中间剃了下去。当时，我几乎不敢看彭老师，心中有愧可又不能表现出来。彭高致一直是我们的敬爱的老师，北京市优秀语文教师，25中优秀班主任。我们这些学生昧着良心批判他算什么事？但我暗暗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

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我不能当两面派，要表现出强烈地阶级感情。我看到彭老师脸有点红，有点扭曲，但很快就低下了头。我心里挣扎得更厉害了。许多同学不忍看到这种场面，也都低下了头。批判会草草收场。

1967年10月，我跟着高三的曲折等少数同学第一批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几年后，我回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约了我们班的同学郑协去看彭老师。彭老师看见我们有些惊讶。我没坐下就说，彭老师，我对不起你，我昧着良心组织批判会，这是我一生的污点。怎么道歉都无法消除我的愧疚。彭老师说，千万别愧疚，一场运动来了，谁能躲得过。那么多国家领导人都打倒了。他们干了一辈子革命，惹着谁了。彭老师说刚解放时，他确实对新中国充满希望。觉得共产党有能力建设好一个中国。那时候他也是热血沸腾地拥护共产党，努力工作。彭老师还说，共产党清理旧中国的腐败和污泥浊水很有魄力。比如扫荡妓院，改造妓女。打击不法商人等等。可后来对知识分子不好，总搞阶级斗争，搞运动。……

彭老师被赶出25中后调到了国子监中学，后来又调到了27中。退休时是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书法协会副会长。彭老师88岁生日时，我们班同学为他组织了生日宴会。25中校长，校理事会会长和副会长曲折都来了。也是对彭老师表达歉意。

这篇回忆，我其实早就想写出来。但我不敢拿出来，我怕再次触痛彭老师的伤疤。另外我也不知道同学们会怎么看我，是不是能接受我的认识。我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绝不是什么探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作为红卫兵参加了一些“破四旧”和抄家活动。这些活动对我的头脑冲击很大。街道和居委会的人领着我们到资本家、地主和前国民党军官家进行查抄，寻找反革命反攻倒算变天的证据。我看见那些中学生抄家打人，但心里却同情那些老头、老太太，对他们一点都恨不起来。有些军队子弟穿着黄军装，抡着苏式铜头皮带到处打人。在查抄王府井旁边的一户资本家时，那家老太太见到是几个文雅的女孩子，就哀求放过他们。没想到这反而激怒了这几个女生，突然就开始疯狂殴打那个老太太，她们面目狰狞，心狠手毒，把人打得头破血流。我上前阻止，问为什么突然打人？她们说：她以为我们心软？我们对阶级敌人绝不心慈手软！我暗自心惊：少女天使怎么转眼就变成暴徒魔鬼了？



一天晚上，学校通知红卫兵集合。说有阶级敌人猖狂反扑，要去灯市口中学操场进行大辩论。等我们赶到时，有些人在高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歌”。还不断狂呼：“狗崽子不投降，就让他灭亡！”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口号，接受不了。我当即对初中的同学们说：这是一个反动口号！不准跟着喊！于是，25中初中的同学都安静下来。可高中的许多同学还是跟着喊，并对我们说这是革命口号，全北京革命家庭的人都赞同这个对联。这时，有红卫兵提出不同意见：许多领导人的家庭是地主或资本家，但他们都走上了革命道路。“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是错误的。辩驳双方一下子剑拔弩张，赞同这个口号的人质问：你们这些反对这个口号的人是什么家庭出身？回答是革命干部和工人。有一个高中同学说，我家三代都是工人，但我不认为我一辈子就必然都能是一个革命者。我必须经过自己不断努力才能做到。我非常同意这个同学的话，不认为家庭出身就能够决定人的一切。部分学生开始漫骂攻击，说这些不同意血统论对联的同学是叛徒，立场不坚定。双方争吵不休，在混乱中结束了辩论会。

第二天，25中红卫兵总负责人滕耕耕找到了我，说有人举报我反对那个对联，我诚恳地谈了自己的观点。滕耕耕宣布：对我警告一次。我虽然不服但又没办法。我心里有些紧张，后来趁一个人值班的时候，取出盖有大印的学校介绍信本册，开出了几十张同意去外地进行大串联的介绍信，给了班上的许多同学。没过几天，滕耕耕就找到我，说有人举报，我开串联介绍信给班上出身不好的同学。决定将我开除出红卫兵，撤销我的初中负责人。于是，我就离校去外地串联了。

回到北京后，我基本上是逍遥派，不参与学校的文革活动。那时，北京中学里的“四·三”和“四·四”两派针锋相对，斗得很厉害。后来军代表派驻北京各中学组织军训，我仍然很消极。军代表找到我，认为我还是适合做初三四班的负责人。于是，我又成为班级负责人，后来还组织了国庆游行彩排等活动。

一天，我听说曲折等高中同学准备去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这个正中我心。我深受感动，也非常向往，要求一起去。但回答说已经凑齐了10个人，够了，我很失望。后来又说有一个人去不成了，我可以参加，我非常激动。到祖国的边疆去，奉献青春、建设内蒙古草原，这就是我当时的理念。其实我当时有很多路可走，当兵，或到工厂去。但我义无反顾地走了。班里的很多同学都不理解，

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去内蒙古插队。我也一直在问自己。一是我对文革中无休止的派性斗争感到厌烦。二是对曲折，郭兆英等兄长的信任和佩服。三是我也愿意像很多前辈一样，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付出了宝贵的青春，也经受了磨砺，了解到中国的国情。☞

【述往】

## 1973-1977: 我的“二外”记忆 (11)

### ——有条纪律是：不许谈恋爱

李红云

在2021年北京大学为2020年毕业的同学补办因疫情未举行的毕业典礼上，有同学当场求婚。当然，求婚成功，老师和同学，甚至学校的领导向他们送上掌声和祝福。在网上搜了搜，发现这种事情在很多高校的毕业典礼上都曾有过的，其实很普遍。

这种现在很普遍的事，在我们当年是想都不敢想的。

二外校园里没有什么美景，最美的景色也就算那条小路两旁的梧桐树了。那些梧桐树枝干挺拔，根深叶茂。尤其是到了秋季，会展现一把“梧桐一叶落，天下皆知秋”的景色。据说梧桐树雌雄异株，梧是雄树；桐是雌树。梧桐同长同老，同生同死。在古代常以梧桐来暗示男女之间海枯石烂的忠贞爱情。

因此，要说最浪漫的树，当属梧桐。

在这浪漫的梧桐树下，在那风华正茂的年龄，原本应该演绎出许多浪漫的故事，但一条纪律让所有的浪漫都不存在。这条纪律就是——不许谈恋爱。

这条纪律是入学后即宣布的。对于现在的年轻学生来说，这条纪律看起来既荒诞又不近人情。但当时的“明令禁止”并不是二外的首创，而是教育部的规定，该规定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七十年代末。

这条纪律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延安时期。当工农红军的主力转移到陕北后，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请示毛泽东，要求

抗大学员必须遵守“学习期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的纪律。<sup>1</sup>这条纪律在战争环境下提出，而抗大又是按军队编制组织起来的军官学习，自然不难理解。这条纪律意味着革命者不能为恋爱和婚姻影响革命事业。“革命”与“恋爱”相比，前者是关系民族命运的大事，后者则是屈居服从地位的个人小事。<sup>2</sup>

这样，“明令禁止”的规定就此延续了下来。

当时大学对工农兵学员实行的半军事化的管理，二外也不例外。在“革命利益高于天”，“个人利益要服从组织”的那个年代，这样的纪律并没有人敢公开提出质疑。

可是，一条纪律怎挡得住青春年华，青春的校园怎少的了恋情欢歌呢。纪律归纪律，一些地下恋情还是悄悄地发展，大多数同学也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否能“平安无事”就要看运气了。

有一次，我们年级一对正在热恋的情侣同学趁着夜色在校园里有些亲昵的动作。很不幸，他们被一群在校园里玩捉迷藏的孩子们发现了。这群半大的孩子立刻变身抗日小英雄，他们像见到日本鬼子一样，抓起石子、土块就向二人扔过去，吓得二人抱头鼠窜。“小英雄们”哪肯放过抓“鬼子”的好机会，在后面穷追不舍，边追边高喊着“抓流氓啊！抓流氓啊！”直到有同学发现，拦住了那几个“小英雄”，二人才得以脱身。

这事幸亏没有人报告。如果让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老H知道了，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老H是我们英语系73级的专职党支部书记，他是在文革期间北京政法学院解散后辗转调到二外的。H是1949年后中国政府派到苏联的首批留学生，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在苏联期间他娶了一位苏联姑娘为妻，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这段婚姻最后以悲剧告终。此后，老H没有再婚。不知是否与他的这段经历有关，H对同学中的恋情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态度。

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让老H有了依据这条纪律处理学生的机会。

Q，男生，北京人，党员，军队干部子弟。那个年代，由于父亲就在部队工作，他没有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去农村插队，而是得到了令人羡慕的参军的机会，

<sup>1</sup> 莫文骅：《莫文骅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173页。

<sup>2</sup> 李秉奎著：《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7月版，第62页。

并在部队入党，复员后到北京市的卫生系统工作。Q入学后最初在二班当班长，后来调整到我们班任班长。印象中，Q个子不高，戴一副黑框眼镜，总是穿绿色的军装上衣，因为他是在空军当兵，所以总穿空军的蓝裤子。Q性格开朗幽默，会写诗填词，还有一副男高音的好嗓子，经常在年级的联欢会上高歌一曲。

M，女生，也是北京人，党员，来自于北京的某工厂。她入学后与Q同在二班，M任党小组组长。班长和党小组长，二人组成班上的“领导班子”。因此，他们在工作上是搭档。这种学习和工作上的关系，互有好感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与他们二人原本都不熟悉，后来Q调到我们班任班长，于是逐渐熟悉起来。由于M经常来我们班找Q玩，我也就认识了M。

一年放寒假前，Q找到我说，“过了春节，你带M来我家玩吧。我跟她说好了。”并告诉了我时间。当时，并没有适合的社交场所，没有咖啡厅，餐厅也很少。同学之间的交往基本是去家里。我家离Q家不远，跟M也比较熟了，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

到了约好的时间，足足等了一天，M也没有来找我。第二天Q匆匆来到我家，询问情况。我告诉他是因为M爽约了。看得出Q很沮丧，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些M没来的理由。

紧接着新的学期开始了。开学后的一天晚上，Q找到我，手里拿着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他告诉我，里面是他写给M的诗，请我把这个小本子转交M。以诗文示爱，在古代就是男女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见我犹豫，Q说，“其实也没写什么，你看看吧！”我翻了翻，无非就是一些夸张地赞美女孩的词句，“面若桃花、香腮……”。在Q的坚持下，我找到M，把那个寄托了Q一片深情的小本子交到了她的手里。

没想到，没过一会儿，M满脸涨得通红地来找我，先是把Q大骂一顿，然后她告诉了我她的决定：把这个小本子交给“组织”处理。我一听就急了，连忙劝解，“如果你不接受，交给我退给他就是了，不要交啊！”“你这样做对Q会造成什么后果？你不会不知道吧。”然而，我的话M一句也不听进去，反过来指责我多管闲事。眼看劝说无果，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M拿着那个小本去找老H了。

我能做了，就是心急火燎地跑去把这个“噩耗”告诉了Q。我不知道那个夜

晚 Q 是怎样熬过的。对他抗击打能力的考验第二天才正式开始。

先是老 H 在全年级大会上不点名地讲了这件事，措辞严厉并带着讽刺、讥笑和挖苦。同时，H 点名表扬了 M 同学，表扬她“遵守纪律、觉悟高、相信组织”等等。接下来 H 提到，“有个同学知道这件事，不仅没有向组织报告，反而……”。我坐在下面，低头听着，知道他是在说我。会后，H 把我叫去进行了一次严厉的谈话。我硬着头皮听着他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

几天后，Q 被要求在党小组会上做了检查。

这件事，虽然没有公开点 Q 的名字，但全年级都知道老 H 说的是谁。示爱的表白被拒本来就是打击，但更大的打击是“交给组织”。这种当众羞辱对 Q 的伤害是残酷的。

那段时间里，同学中也有一些冷言冷语。Q 整日灰头土脸，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幸亏有几个好友陪伴他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

这件事之后，Q 明显失去了“组织”的信任。勉强做完了一个学期的班长之后，新学期班级重组，Q 被免职，直到毕业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干部。我也明白，这件事后，我也不再是“组织”信任的人。

而 M 却因此获得了“组织”的信任，特别是老 H。毕业分配时，根据“哪来哪去”的原则，原本应该回工厂的 M 留校任教。

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再后来，听说 Q 和 M 各自组建了家庭。我再也没见过他们。不知道他们后来如何看待当年的这段往事。不知道 Q 是否还对 M 心存怨恨，也不知道 M 是否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过反思，她是否对 Q 说过一声“I am sorry”（对不起）。她是否明白了：可以不爱，但，请勿伤害。

令人唏嘘的是，Q 在 2010 年 9 月病逝于美国旧金山，终年 59 岁。他去世后，我看到了他生前写的一首词：“《高阳台》——浮生半日”。词中写道：“看飘零，柳絮槐花，敢忆从前？”读到这句，眼前浮现的竟是他当年失魂落魄的样子。

Q 其实还算是幸运，起码档案里没有装着那种能跟上他一辈子的处分。但另一个故事的当事人们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这是我们年级“一个女生和三个男生”的故事。

W 是一位女生，来自于河北省某市，是从工厂选送来上学的。她的英语说得很好听，语音语调纯正。正当大家即将毕业的时候，突然传来 W 睡了我们年

级三位男生的消息。三位男生中二人为党员，另一位是团员，W也是团员。这种事情传得很快，起初只是风言风语，很快消息得到了证实。据说事情的败露是学过刑侦的老H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找W谈话，W一害怕就自己全招了。

毕业前的一天，全年级的党员和团员分开召开了会议，会上公布了W和其他三位男生的行为，包含了一些细节。用今天的语言表达，他们就是谈恋爱，或以谈恋爱为名睡了。那时的革命意识已经疲软，压抑的原始本能在特殊的环境里爆发了。在那个封闭又保守的年代，谈个恋爱都是大逆不道，有这种事情的就都是“流氓”，是“生活作风问题”，后果十分严重。这个“罪名”足以毁掉一个人。

我参加的团员大会，会上要求大家对如何处理W和那名男生进行讨论并举手表决。对W大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一致同意开除团籍。但对那位男生的处理有些争议。记得有一位同学极力为他辩解，认为他是受到了诱惑，不应开除。但最后的表决结果是多数人同意开除其团籍。

很快，W和三名男生的处理结果就出来了。对W的处分最为严厉，开除学籍，遣送回家，并开除团籍。这意味着她这三年半的学算是白上了。两名男生党员给的是党内处分，团员是团内处分。

记忆中没有宣布这些处分的依据是什么，而且入学后并没有宣布过什么“违纪处分办法”。所以当时处分的依据是什么并不清楚。处理中是否做到了依据准确？处理的程序是否正当？是否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他们是否行使了申诉的权利。这些因没有材料而不能给出明确的结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几位同学的隐私权没有受到尊重和保护。这件本来属于个人隐私的事情，被公布于大庭广众之下，并进行了无情的消费。这对当事人来说是十分残酷的。

处理决定宣布后，我最后一次见到W是在她的宿舍。她蒙着被子躺在床上，脸冲着墙。几个女生围在她的床边，对着她大声训斥、指责。语言中充满了讽刺、挖苦、嘲笑，甚至还有谩骂，但没有一丝同情，没有一句安慰。W始终躺在床上，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发出一点声响。我忽然觉得她有些可怜。几天后，我们毕业离校，W也被遣送回原籍。没有毕业证书，没有分配工作单位，还带着那个可能影响她一生的处分。再后来，就没了她的音讯。

三个男生中最惨的是其中的G，他是党员，还当过班长。他执着地认为自己

就是跟 W 在谈恋爱。甚至在 W 的事情完全败露之后，他还痴情地说，愿意跟 W 组成家庭生活下去。但没有人会听他的辩解。

令人唏嘘的是，背了个处分的 G 离开学校之后，从此一蹶不振。他后来工作、生活得怎么样？是否组建家庭？这些都没人知道。再后来，传来的竟是他已去世多年的消息。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真实故事。

那是一个保守的时代，一个封闭的时代，一个个人的私生活也被贴上了“政治标签”的时代。通常人们认为，文革十年是禁欲主义（asceticism）色彩浓厚的历史时期。年轻人的生活问题得不到应有的指导和帮助，视一切男女爱情为“邪恶”，高校对正当的谈恋爱下了“禁令”。这或许是造成上述悲剧的真正原因。

不幸的是，我的同学成了牺牲品。

多少年后的今天如何看待当年发生的事情呢？

首先，“不许谈恋爱”的规定早已没了踪迹。现在的大学里，谈恋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其次，对于高校学生在校期间的婚前性行为的态度，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 2016 年 12 月 16 日经教育部 2016 年第 49 次部长办公会议修订通过，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sup>1</sup>中，只概括要求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并无未婚性行为方面规定。<sup>2</sup>

倒是在 2019 年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学生手册中的一条规定近日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争议。该校规定，学生在学习期间发生未婚性行为者，将给予记过以上处分。网络上对这一规定提出批评的文章中指出：“在现在的大学里，谈恋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到了研究生阶段，则更为普遍。我们可以简单算一下，大部分人本科毕业时 22 岁，研究生要么是本科毕业后就去读研，要么是工作几年后再

<sup>1</sup>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见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1702/t20170216\\_296385.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1702/t20170216_296385.html)。访问时间 2021 年 10 月 23 日

<sup>2</sup> 详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一）违反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破坏安定团结、扰乱社会秩序的；（二）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刑事犯罪的；（三）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四）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或其他器材作弊、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牟取利益，以及其他严重作弊或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五）学位论文、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存在抄袭、篡改、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的，或者代写论文、买卖论文的；（六）违反本规定和学校规定，严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管理秩序的；（七）侵害其他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八）屡次违反学校规定受到纪律处分，经教育不改的。”

回来读研。也就是说，大部分研究生至少是22岁起步，而22岁已经达到了适婚的年龄，很多人都开始交往对象。正值激情澎湃的青春年华，加上思想的日渐开放，婚前性行为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件看上去很正常的事。”<sup>1</sup>

至于对这类学生的处分，有人明确指出：“这条规定，本身并没有错，但随着观念的变化，婚前性行为，已由‘不道德’慢慢转变成‘不提倡’再到‘顺其自然’，但如果发生了，也不能够去谴责，如果还用‘记过’去处分学生，更是不可取。”<sup>2</sup>

著名性学家彭晓辉在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时指出，没有任何法律禁止未婚成年人的性行为，但在惯例中学校对道德、纪律的要求比其他社会单位要严格。性行为是成年未婚学生的权利和私事，在没有造成负面后果的情况下，学校一般不会主动介入。<sup>3</sup>可见，现在的观念与我们那个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最后，对于谈恋爱及有婚前性行为学生的处理还涉及个人的隐私权问题。

根据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自然人享有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权利。特别是人格权和隐私权的保护。<sup>4</sup>当然，该法并没有追溯既往的效力，我只是借用现在的观念与当年的事情作一比较。当年在处理“一个女生和三个男生”的事情时，不仅公开进行讨论，并公布细节，这种做法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权和隐私权。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做法对这些同学造成了伤害和影响，G同学就是一个例子。遗憾的是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毕业后，大家离开学校，那些校园里的地下恋情也纷纷浮出水面。后来也有喜讯传来，我们年级中至少有9对同学终成眷属。其中不乏党员同学。也许他们中会有梧桐树下的浪漫故事。

看来，一条纪律还是挡不住青春的脚步。

看到现在网络上的讨论，真是感到这个社会还是进步了。👍

<sup>1</sup> 参见：“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手册十九条：学习期间发生未婚性行为者，记过”，《教育向前冲》，2020年9月27日。网络资料 <https://baijiahao.baidu.com/?id=1679000965858399901&wfr=spider&for=pc>，访问时间 2021年10月23日

<sup>2</sup> 参见：“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手册十九条：学习期间发生未婚性行为者，记过”，《教育向前冲》，2020年9月27日。网络资料 <https://baijiahao.baidu.com/?id=1679000965858399901&wfr=spider&for=pc>，访问时间 2021年10月23日

<sup>3</sup> 参见“多所高校规定学生未婚性行为将被处分，专家：为应对产生‘负面事件’”，《顶端新闻官方账号》2020年9月13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id=1710932750944357713&wfr=spider&for=pc>，访问时间 2021年10月23日

<sup>4</sup>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一十条 【具体人格权】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述往】

## 平民往事三则

郑凯民<sup>1</sup>

### 咳嗽糖浆白兰地

70年代初，耀寰<sup>2</sup>在湖北，我在四川，碰巧都回天津探亲。我爸重病，从牛棚放了出来，托人求爷爷告奶奶，被放置在睦南道天津一中心的“大车店”式的所谓病房里。那时医生护士觉悟都很高，不但心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个个的小脸儿绷得更紧。病危的阶级敌人，只有躺那儿等死的份儿。我想，这些曾经善良的女人们，当时可能为不能亲手消灭这个病床上的老反革命而遗憾。

本来卑微无助，碰到灾难就更卑微无助。家里气氛只用一个词可形容——“凄惶”。正值残冬，我从医院值班回到蜗居。近傍晚，耀寰来访。那时人家躲还躲不及，没有别人来做客。先说了说父亲的病情，接着我们打开别的话题。聊了一会，僵直的身体中渐渐有了一丝暖意和生气。耀寰挺能侃，记得当时聊得是清宫四大奇案啥的。停电，点了根蜡烛。

我说，喝点酒吧。于是请妹妹出去沽点散白酒，没有空酒瓶，找了个挺大的药瓶。妹妹回来后弄了俩菜，两人开喝。一口下去，味道略有药味而回甜，我大赞，这是哪弄的白兰地！？我妹看了看说，原来瓶里的咳嗽糖浆还有，又打了白干，估计应该是你说的“白兰地”。

转年回津探亲，耀寰已结婚，我去他家拜访。自然留饭喝酒。徐太太去采买酒菜。临走时男主人叮嘱女主人道：别忘了去药房买瓶咳嗽糖浆！

### 地狱里的活雷锋

老爹（其实那时不老）进了“大车店”，尚天裕对我说，凶多吉少，早作准备。已是最保守的说法，我们自然明白。作为全家唯一男丁，值夜班。“大车店”在医院最后面，窗外对着大理道。房间和一间教室大小相当，病床床头对墙沿四

<sup>1</sup> 郑凯民是清华大学的一位校友的丈夫。

<sup>2</sup> 耀寰指徐耀寰，清华校友。

壁摆放，至少有20张。病友有郊区农民，城市小厂的工人，职业不稳定的贩夫走卒，叛徒特务走资派（小走资派）。

几乎全是绝症，竖着进来横着出去。除个别濒死的病人晚上有人陪，我是夜间最固定，最合法、最健康，最年轻的陪护者。占用了病房唯一一张一米多长的桌子，实在挺不住，蜷缩而眠。半夜12点左右是老天爷收人的时候。收尸时人不够，一般是值班护士临时找别的病房的另外一个护士帮忙。虽然白天看着医生护士个个像白衣杀手，但看女人收拾一具尸体也挺难，俺不能不搭把手。

反革命家属也要学雷锋不是？几次下来，很是得力。值班护士也不再在医院找别人了，都让我帮着干。那时候人人不讲客套，不用通名。年纪大的叫我小伙子，稍年轻叫大个子。

收尸程序很简单，比高数容易得多，不用学。两米长一点的白单子，一边对折缝上，一边不缝。把人摆平，缝合的一边往脑袋上一套，下在住脚杆处折回兜住，用小绳子一捆。然后隔着白单子找到大脚趾（好像左右不限），捏把捏把突出脚趾，套上一个橡皮筋拴住的标签，标签上写上死者名字和床号。一切完毕，往带轱辘担架车一放，叫来看太平间的工人，拉走。

一条生命就此结束。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看造化了。

我很积极，写标签的文字工作也不用护士，我就代劳了。床头有名字号码，照着写就是，又不用更复杂的信息（如出身学历职位爱好特长啥的）。写多了，女护士对自己的那笔狗爬字越来越没信心，而对额那一手硬笔书法越加钦佩。后来护士嫌到太平间叫人麻烦，我把推车到太平间的工作也包揽下来，送苦命的死者最后一程。每次离开太平间，都会说声：大叔（或大婶大哥大姐），再见了您那。心里清楚，不用多久，最后一次说再见的那个人将是自己的父亲。

## 是谁抽走了我们心中的善？

走廊里有一桌一椅，值班护士待在那里。旁边墙上挂着一幅可以查病人卡片的玩意儿，卡片上有每个病人的姓名，床号和病情。

刚住院时我爸那张卡片写的是“肝炎”，没过两天就改成了“肝癌”。病情本当是对患者隐瞒的，我要求改回来。护士不理睬，嘴里呜里呜鲁说什么听不清，看口型好像说的是“反革命”之类。紧箍咒一来，没啥好说的，估计父亲也看不

到，但总要表示抗议。我盯住她的眼睛，她也不示弱，本不相识的两个人都在用眼睛送给对方轻蔑和仇恨。

阿Q穷贱且笨，和王胡过招不是对手，找来找去找个最弱的小D，还是不行，只勉强打个平手。从此没有了信心，但Q哥心理活动依然丰富，悟出了个“怒目而视主义”，受了欺负，不敢打不敢骂，便“怒目而视”。我也只剩下这个武器。

都是绝症，死的横着出去了，活的又竖着进来，那段时间整个病房几乎换了一拨。绝症病人有的是，二儿他爸说话了：今个儿这一拨过去了，我一扫听嘿（津话打听之意），明儿还来一拨哪！

病人中以癌症，心力衰竭和肾衰竭最多。有一位心力衰竭的病人，据我姐姐说是她们渤海无线电厂的书记，不知为何也成了“反革命”。看来这人没小孩或孩子太小，只见过他的太太，夫妻两个人年纪都不大。心力衰竭者好好调养本不当速死，但这个书记脾气很不好。每每趁人不注意就把鼻子上的氧气管拔下来，被发现抢救多次，而每次活了后都对太太大发脾气，并继续用此法来向死亡飞奔。

女士眼神早已麻木，身心已经疲惫的极点，整天昏昏沉沉地趴在丈夫脚下。那是两盏行将枯灭的油灯，其中一盏正努力地使自己早日熄灭，把残存的一点油留给对方。医护人员没办法，允许他太太整夜陪床。终于在某天深夜，书记拔了管子没人知道，再看已断了气。于是护士和我按程序裹白单子，挂牌，送太平间。

已经死的走了，等死的马上要进来，护士催着女人走人。这女人不说话，眼睛是两眼干枯的井，不会流泪。收拾东西，东西特别多，尤其是食品。举凡有：饼干、奶粉，橘汁、苹果罐头、橘子罐头等，够重的，根本拿不动。央求护士留下这些东西或帮助扔掉，护士板着脸说，不行。想送给邻床的病人，护士还说不行，别人忌讳死人的东西，也都说不要。把眼光转向我时，我马上说，我要，我自己吃。护士不好意思再阻拦。帮她提着东西送到医院大门口，半夜没处可去，她坐在对门副食店的台阶上，初春，很冷。

第二天上午换班回家，看她还在台阶上裹着棉衣熟睡，没打搅她。❷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1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